

## ※ 文哲論壇 ※

# 張深切和下村湖人的對決： 以臺中一中罷課事件為主

張季琳\*

## 前 言

張深切(1904-1965)是日據時期相當特殊的文化人士，幼年受過傳統的私塾教育，曾經留學日本和中國，他的一生從遺憾「恨不生為日本人」的崇拜日本文化，到「亡國之民的悲哀」的民族意識覺醒，而後從事抗日政治活動。張深切從政治方面展開對日本殖民帝國的抗爭之際，因為主導「臺中一中罷課事件」<sup>1</sup>而被捕入獄，在獄中努力閱讀書籍的結果，體悟到唯有深耕文化思想，才能真正解救臺灣，因此出獄後組織「臺灣文藝聯盟」<sup>2</sup>，發行臺灣第一部全島規模的文藝雜誌《臺灣文藝》，

---

本文改寫自張季琳：《台湾における下村湖人——文教官僚から作家へ》（東京：東方書店，2009年）。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本文改寫時增加新發現的資料，為方便讀者理解，也引用筆者曾發表之相關論文，希望有助於深入理解張深切對臺灣民族運動和文化社會的貢獻。

\* 張季琳，本所副研究員。

<sup>1</sup> 關於臺中一中罷課事件，參閱下列資料：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著：《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臺北：臺灣總督府，1939年；臺北：南天書局，1995年復刻版）。藍博洲：《日據時期臺灣學生運動(1913-1945)》（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藍博洲：《民族純血的脈動——日據時期臺灣學生運動(1913-1945)》（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6年）。朱佩琪：《臺籍菁英的搖籃：臺中一中》（臺北：向日葵文化，2005年）。

<sup>2</sup> 臺灣文藝聯盟創立於1934年5月6日，宗旨為「同志親睦、振興文藝」。本部設於臺中，鹿港、豐原、臺北、嘉義、埔里、佳里設有支部，東京臺灣藝術研究會也是支部之一。臺灣文藝聯盟發行雜誌《臺灣文藝》，中日文並刊，創刊於1934年11月5日，1936年8月停刊，共發行15期。參見陳芳明：〈亞細亞孤兒的聲音——張深切與《里程碑》〉，收入陳芳明、張炎憲、邱坤

引發臺灣新文學運動，對臺灣文化有重要貢獻<sup>3</sup>。

尤其，張深切和臺中一中罷課事件的另一位主要人物，臺中一中校長下村虎六郎(1884-1955)的對決，不但震撼殖民地教育體系，也為日後下村校長放棄文教官僚的生涯埋下契機。下村虎六郎後來更改筆名為下村湖人，投身社會教育工作，致力於文藝創作，而以《次郎物語》、《論語物語》等名著影響戰後日本文教界至今<sup>4</sup>。可以說，臺中一中罷課事件改變了因事件而被退學處分的臺灣學生的命運，也改變了張深切的命運，創設了臺灣新文學的生機，甚至影響了戰後的日本文壇。

臺灣學界歷來有關張深切的傳記與思想、政治活動與文藝活動的研究成果相當多，以張深切為主題的博士<sup>5</sup>、碩士論文至少有五篇<sup>6</sup>，而中國近年也有討論北京時期張深切的博士論文<sup>7</sup>和專文<sup>8</sup>。但是就筆者所知，關於張深切主導臺中一中罷課事件的經過，尚無專文討論。因此，本文從代表日本官方立場的下村湖人與《臺灣日日

---

良、黃英哲、廖仁義主編，張孫煜監製，吳榮斌策劃：《張深切全集》（臺北：文經出版社，1998年），卷2，頁755-767。王文仁：《日治時期臺人畫家與作家的文藝合盟：以《臺灣文藝》(1934-36)為中心的考察》（臺北：博揚文化出版公司，2012年）。

<sup>3</sup> 參見黃英哲：〈總論：張深切的政治與文學〉，收入《張深切全集》，卷1。

<sup>4</sup> 關於下村湖人的生平，參閱張季琳：〈下村湖人の台湾経験と《次郎物語》〉，黃自進主編：《近現代日本社會的蛻變》（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專題研究中心，2006年），頁503-521。張季琳：〈下村湖人的臺灣經驗和《次郎物語》〉，《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7卷第3期（2007年9月），頁201-221。

<sup>5</sup> 簡素琿：《日據時期啟蒙思想的五個面向：臺灣殖民地現代性的建立與張深切思想的指標性意義》（臺北：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年）。

<sup>6</sup> 林純芬：《張深切及其劇本研究》（臺中：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黃東珍：《張深切《孔子哲學評論》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張志相：《張深切及其著作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鍾政榮：《由日據下臺灣文學的發展論張深切的戲劇活動》（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

<sup>7</sup> 王申：《淪陷時期旅平臺籍文化人的文化活動與身份表述——以張深切、張我軍、洪炎秋、鍾理和為考察中心》（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10年）。

<sup>8</sup> 楊紅英、張春歌：《〈臺灣文藝〉與《中國文藝》之關連》，《抗戰文化研究》第5輯（2011年），頁33-43。楊紅英：〈近代臺灣黎明的呼喚——張深切文學活動之探討〉，《華文文學》第106期（2011年5月），頁77-81。王申：〈淪陷區文學研究——《藝文雜誌》事件中的張深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0年第1期，頁170-184。張泉：〈張深切移居北京的背景及其「文化救國」實踐——抗戰時期居京臺籍文化人研究之一〉，《臺灣研究集刊》，2006年2期，頁80-88。陳言：〈淪陷時期張深切與周作人交往二三事〉，《新文學史料》，2004年4期，頁87-91。

新報》、《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以及自許為臺灣民眾喉舌的《臺灣民報》、臺中一中校友會、張深切個人傳記等相關資料，嘗試考察臺中一中罷課事件的多重面貌，並經由耙梳張深切和下村湖人的對決經過，希望有助於深入理解張深切的民族運動體驗與其文學創作的關連。

## 一、張深切的重要性

張深切<sup>9</sup>出生於南投草屯，因家境貧困，五歲時過繼給樟腦商人張玉書<sup>10</sup>。臺灣總督府在一八九八年即頒布「臺灣公學校令」，確立對臺的國語（日語）普及教育。但是喜愛詩詞寫作的養父張玉書於一九一〇年，將七歲的張深切送入私塾，師事前清秀才洪月樵<sup>11</sup>、施梅樵<sup>12</sup>，令其接受傳統漢文教育。張深切直到十歲才被送入草鞋墩公學校（今草屯國民小學）<sup>13</sup>就讀。張深切就讀公學校五年級時，因為同學誣告他在教室內說臺灣話，而被處罰打掃教室。打掃時，張深切對其他小朋友說：「我們為什麼不能講臺灣話呢？鳥兒有鳥兒的話，猴孫有猴孫的話，牠們都能說自己的話，為什麼我們倒不如動物，不能說自己的話，說了便要受處罰，這太豈有此

<sup>9</sup> 本文有關張深切的生平敘述，主要依據張深切自傳《里程碑——又名：黑色的太陽》（簡稱《里程碑》）（臺中：聖工出版社，1961年）、張深切：《我與我的思想》（臺中：中央書局，1948年）、張志相編：〈張深切年譜〉，收入《張深切全集》，卷2，「附錄」。

<sup>10</sup> 張玉書(?-1939)，草屯人，號笏山。自幼喜讀書，曾任黃春帆掌櫃而與霧峰林家熟識，後在草屯辦腦館（將樟腦原油分裝送繳政府進一步精製的民間工廠），家道漸富裕。1920年加入櫟詩社，1925年與友人創立南陔吟社，1931年曾在「炎峰青年會」附設之讀書會擔任漢文教習。著有《笏山詩草》。詳張深切：《里程碑》，收入《張深切全集》，卷1，頁74-79。

<sup>11</sup> 洪月樵(1866-1929)，本名洪一支，又名攀柱，字月樵，號棄生，彰化鹿港人。乙未割臺後，堅不剪辮，拒穿洋服，拒講日語，終生以遺民自居，曾與友人共組鹿苑吟社，著有《寄鶴齋詩文集》等。洪月樵次子洪炎秋(1902-1980)，畢業於北京大學，曾任《國語日報》社社長、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參見施懿琳、許俊雅、楊翠：《臺中縣文學發展史》（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頁109-110。

<sup>12</sup> 施梅樵(1870-1949)，字天鶴，彰化鹿港人。著有《捲濤閣詩草》、《鹿江集》、《玉井詩話》等。參見林翠鳳：《施梅樵及其漢詩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8年）。

<sup>13</sup> 「公學校」是殖民時期臺灣人子弟就讀的小學，日本人子弟就讀的學校稱「小學校」。兩者教材完全不同，師資設備亦有明顯差別。參閱李園會：《日據時期臺灣初等教育制度》（臺北：國立編譯館，2005年）。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事業公司，2003年）。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5年）。

理！」<sup>14</sup>如此，張深切因莫須有的誣告受處罰，又因直言不諱的個性，被日籍教師毆打成重傷，甚至被開除學籍。

當時霧峰仕紳林獻堂<sup>15</sup>和張深切的養父張玉書都是櫟詩社<sup>16</sup>的成員，彼此熟識，林獻堂很欣賞張深切的勇氣，勸其養父讓張深切去日本留學，獲得同意。一九一七年八月林獻堂帶著十四歲的張深切到日本，協助住宿在日籍老師家，安排張深切就讀東京傳通院<sup>17</sup>附近的礪川小學<sup>18</sup>五年級，之後，張深切輾轉就讀豐山中學<sup>19</sup>和青山學院中等部<sup>20</sup>。有臺灣民族運動先驅之譽的林獻堂，不僅協助張深切赴日留學，後來張深切組織「臺灣文藝聯盟」，發行《臺灣文藝》時，林獻堂也都慷慨贊助經費，林獻堂和張深切的特殊情誼及臺灣新文學運動的關連，值得今後深入探究。

張深切在日期間熱心學習柔道、劍道，一心想做一個真正的日本人：「覺悟我應該做日本國民，說日本話，讀日本書，學習日本人的民情風俗習慣。」<sup>21</sup>「進入小學校以後，過不了半年，不僅在外觀上看不出我不是日本人。就心理方面說，我和日本人也似乎沒有兩樣，……過去被開除學籍，被罵『清國奴』的怨恨，一似船後

<sup>14</sup> 張深切：《里程碑》，頁 115。

<sup>15</sup> 林獻堂 (1881-1956)，臺中霧峰人，臺灣民族運動家，櫟詩社成員。日據時期曾擔任臺灣最重要的文化啟蒙運動與抗日運動之團體「臺灣文化協會」總理，亦曾擔任臺灣民眾黨顧問，組織臺灣地方自治聯盟並致力於漢文化的保存工作。參見許雪姬：〈《灌園先生日記》的史料價值〉，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一九二七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第 1 冊，頁 1-17。

<sup>16</sup> 廖振富：《櫟詩社研究新論》（臺北：國立編譯館，2006年）。

<sup>17</sup> 傳通院，淨土宗寺院，位於東京都文京區小石川。1415年開山，最盛時有 1000 名學問僧居住，鑽研佛法。幕府將軍德川家康的母親、永井荷風、佐藤春夫等知名人士亦安葬於此。參見傳通院官網：<http://www.denzuin.or.jp/>。

<sup>18</sup> 東京市立礪川小學，今東京都文京區立礪川小學校。1873年3月，借用傳通院的開山堂創立，1924年設立全日本第一座小學校園內的游泳池，1934年設立日本小學第一個聽障班，參見網站：<http://www.bunkyo-kyo.ed.jp/rekisen-ps/>。

<sup>19</sup> 私立豐山中學校，今日本大學豐山中學校·高等學校。該校為東京都文京區真言宗護國寺於 1887年設置之中學林，中學林於 1903年改制為私立豐山中學校，戰後併入日本大學豐山學園，參見網站：<http://www.buzan.hs.nihon-u.ac.jp/about/history.html>。

<sup>20</sup> 青山學院中等部，戰後學制更改為青山學院高等部，屬基督教會學校，參見青山學院中等部網站：<http://www.jh.aoyama.ed.jp/>。

<sup>21</sup> 張深切：《我與我的思想》，收入《張深切全集》，卷 3，頁 73。

的波瀾，倏然消失。這裏的生活，使我樂不思蜀，反以做得了日本人，覺得心滿意足。」<sup>22</sup>但是六年級時，張深切在和日籍老師練習劍道時發生衝突，張深切被日籍老師辱罵「支那人」、「清國奴」。張深切的民族意識再度燃起，「到這時候，我才痛感到亡國之民的悲哀。想到：你既然是亡國奴，你就是征服者的奴隸，無論你有什麼經天緯地的絕才，或出類拔萃的學識，都沒有用，亡國奴不應該和有國家的國民平等，奴隸不應該和主人站在同一的地位，一希望要平等，一想要同一地位，就是叛逆」<sup>23</sup>。小學畢業後，張深切進入附屬佛教寺院的豐山中學，由於修習東洋史課程得知中國悠久歷史文化的博大精深，因而認為臺灣人就是中國人：「我讀了祖國的歷史，好像見著了未曾謀面的親生父母，血液為之沸騰，漠然的民族意識，變為鮮明的民族思想。」<sup>24</sup>自此，「我的思想急激地轉變，把愛日本改變為恨日本，進而又發展到仇日，終於演致和他們開始行動的鬥爭」<sup>25</sup>。於是，張深切搬入臺灣留學生居住的高砂寮<sup>26</sup>，朝夕和臺灣留日青年組織的「新民會」<sup>27</sup>等同志相處，縱談時局，革命思想日益堅固。

一九二三年九月東京發生大地震，張深切就讀的青山學院因震災嚴重而停課，這時正返臺治療肺炎的張深切，經養父同意，於同年年底到上海留學，因語言不通而入學商務印書館的附屬國語師範學校<sup>28</sup>。不久，張深切加入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sup>22</sup> 張深切：《里程碑》，頁 140。

<sup>23</sup> 張深切：《我與我的思想》，頁 76。

<sup>24</sup> 張深切：《里程碑》，頁 166。

<sup>25</sup> 張深切：《我與我的思想》，頁 76。

<sup>26</sup> 高砂寮，1912 年臺灣總督府設立於東京文京區的臺灣人留學生宿舍。1923 年因關東大地震倒毀，1925 年重建，戰後改稱清華寮。張深切認為高砂寮是「臺灣文化運動的搖籃」（張深切：《里程碑》，頁 173）。

<sup>27</sup> 新民會，以東京臺灣留學生為主體所組成之政治運動團體，1920 年林獻堂與蔡惠如在東京創辦。行動目標為：（一）增進臺灣同胞之幸福，開始政治改革運動；（二）擴大宣傳，發行機關雜誌；（三）尋求與中國同志接觸之途徑。對外活動皆以「東京臺灣青年會」舉辦，主要具體行動為推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及創刊《臺灣青年》。1930 年後日趨沉寂。參見何義麟：〈新民會〉，許雪姬總策劃：《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 年），頁 950。另，參見《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第一章〈文化運動〉第三節「東京留學生之諸運動」（頁 23-67）。

<sup>28</sup> 商務印書館創設於 1897 年，是當時最大規模的民營出版企業。商務印書館不僅是新文化的傳播者，也致力於基礎教育和社會教育。1924 年 2 月創辦上海國語師範學校，聘請吳稚暉（吳敬恆）

策進臺灣民族運動的「上海臺灣青年會」<sup>29</sup>。一九二六年冬張深切到廣州，不久即加入「廣東臺灣學生聯合會」<sup>30</sup>。一九二七年初張深切考取中山大學法科政治系，同年二月以假名張死光的身分和張月澄<sup>31</sup>訪問魯迅<sup>32</sup>。同年三月加入在廣州的臺灣青年組織「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sup>33</sup>，擔任宣傳部長。三月二十八日再訪魯迅。同年四月下旬，張深切返臺籌募革命基金。五月，因涉嫌主導臺中一中學生罷課事件被捕。之

---

任校長，普通科第一期學員 50 人，第二期學員 54 人，第三期學員 89 人，補習科 52 人，暑期補習科 102 人。參見王學哲、方鵬程合著：《勇往向前：商務印書館百年經營史(1897-200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7 年），頁 75。史春風：《商務印書館與中國近代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141-142。關於上海國語師範學校的學習情形，張深切有深刻印象，參見《里程碑》，頁 242-245。

<sup>29</sup> 上海臺灣青年會，1923 年 10 月，蔡惠如、許乃昌、彭華英等人於上海南方大學組織之臺灣留學生團體，積極支持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參見張深切：《在廣東發動的臺灣革命運動史略·獄中記》（簡稱《獄中記》），收入《張深切全集》，卷 4，頁 84-110。另，參見〈在支青年學生的思想運動〉，《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頁 68-137。

<sup>30</sup> 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是臺灣學生在廣州成立之祕密革命團體，廣東臺灣學生聯合會為其公開性組織。在嶺南大學臺灣留學生張月澄的號召下，廣東的臺灣留學生於 1926 年 9 月 15 日，在中山大學召開「廣東臺灣學生聯合會」成立大會，會中選出林文騰、洪紹譚、張深切、郭德金、張月澄為委員。參見《獄中記》，頁 84-110。另，參見〈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頁 117-137。

<sup>31</sup> 張月澄(1905-1982)，又名張秀哲，著書《「勿忘臺灣」落花夢》。父親張聰明因開採煤礦致富，《宮前町九十番地》口述者張超英為其子。張月澄 13 歲赴日本京都留學，返臺後就讀日人專屬臺北一中（今建國中學），後再赴香港英人創辦的拔萃書院，大學入美國人主辦的嶺南大學，以及廣州中山大學法科政治系就讀。在廣州期間，與臺灣青年組成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在中國進行臺灣反殖民抗日運動。1927 年在上海遭日人逮捕入獄一年多，受到監視與禁足。解禁後，再度前往中國，遇一二八事變，轉往日本，在東京帝大神川彥松研究室擔任研究員，寫下《國民政府的外交及外交行政》一書。二戰結束後，張秀哲到長官公署工礦處底下的紡織公司任職，1947 年二二八事件，以「叛亂嫌疑」被逮捕入獄，經家族營救後獲釋。1947 年 8 月出版《「勿忘臺灣」落花夢》一書，但又因故回收湮滅。引自張秀哲：〈作者簡介〉，《「勿忘臺灣」落花夢》（臺北：衛城出版社，2013 年）。

<sup>32</sup> 關於廣州中山大學時期的魯迅，張深切有深刻印象，詳《里程碑》，頁 341-344。

<sup>33</sup> 1927 年 3 月，「廣東臺灣學生聯合會」幹部另組「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祕密組織。同年 4 月發行《臺灣先鋒》，主張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推動臺灣民族革命。不久，蔣中正反共並進行清黨，廣州方面也下令解散臺灣革命青年團。1927 年 7 月 4 日，張月澄在上海被日警逮捕，送回臺灣。其餘會員被牽連人數達 64 人，陸續被捕之會員部分被判刑，最高刑期為林文騰的 4 年徒刑。參見《獄中記》，頁 84-110。

後雖無罪開釋，卻因涉嫌「廣東事件」<sup>34</sup>判刑入獄，一九三〇年出獄。出獄後，張深切認為從事社會政治改革運動必須先深耕文化思想。同年八月十六日，在臺中組織「臺灣演劇研究會」，十一月公演其自編自導的《論語博士》、《暗地》、《接木花》等劇<sup>35</sup>。由於日警之刁難有增無減，一九三二年一月至上海，三月進入支援孫文革命運動的山田純三郎<sup>36</sup>主辦的《江南正報》<sup>37</sup>，擔任副刊編輯。一九三四年五月與賴明弘等人組織「臺灣文藝聯盟」，獲選為委員長，同年十一月發行機關雜誌《臺灣文藝》。一九三五年六月，《臺灣文藝》總編輯張星建和日文編輯楊達兩人發生爭執，同年十二月楊達另外創刊《臺灣新文學》，此後「臺灣文藝聯盟」分裂，而於一九三六年八月解散。

一九三九年張深切在北京創刊《中國文藝》<sup>38</sup>。戰後，臺中師範學校洪炎秋邀請張深切擔任教務主任。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時，張深切被誣告為共產黨員，而逃難躲於南投山中。之後，雖被證實為無辜，卻已不再戀棧公職，乃專心於寫作，著述《我與我的思想》、《在廣東發動的臺灣革命運動史略》、《孔子哲學評論》等書。另一方面，張深切也從事電影編導工作，一九五七年和友人創設電影公司，自編自導臺語電影《邱罔舍》<sup>39</sup>，榮獲「第一屆臺語片影展」的特別獎（故事）<sup>40</sup>，此外，張深切也撰寫多部劇本。一九六五年因肺癌於臺中辭世。

<sup>34</sup> 1927年4月15日，李濟深受命於蔣介石，進行廣東內部清黨，「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工作一度沉寂。8月6日，臺灣總督府針對廣東事件關係者進行全面檢舉，人數達64人。至1929年12月計32人被捕。參見張志相編：〈張深切年譜〉，《張深切全集》，卷2，「附錄」。

<sup>35</sup> 《論語博士》、《暗地》、《接木花》劇本皆佚失。參見張志相、黃英哲編輯：〈張深切著作年表〉，《張深切全集》，卷2，「附錄」。

<sup>36</sup> 山田純三郎(1876-1960)，青森縣人，東亞同文書院畢業。兄長山田良政(1868-1900)參加惠州起義殞命，純三郎受其兄感召，終生支持孫文的革命運動，擔任孫文祕書。參閱武井義和：《孫文を支えた日本人：山田良政・純三郎》（名古屋：あるむ，2011年）。張深切自傳《里程碑》對山田純三郎的為人有所記述（頁569-571）。

<sup>37</sup> 《江南正報》，1932年4月創刊，1935年6月停刊。

<sup>38</sup> 張深切於1939年9月創刊《中國文藝》，1940年8月離職。參見陳芳明：〈亞細亞孤兒的聲音——張深切與《里程碑》〉，《張深切全集》，卷2，頁755-767。

<sup>39</sup> 《邱罔舍》，結集民間流傳有關背離仕途的邱罔舍，以金錢和機智遊戲人間的詼諧故事。《邱罔舍》劇本收入《張深切全集》，卷7、卷8。

<sup>40</sup> 《徵信新聞》（今《中國時報》）1957年11月1日主辦第一屆臺語片影展（即第一屆臺語電影片展覽會），參展影片有33部。參見國家電影中心，網址：<http://www.ctfa.org.tw>。

## 二、下村湖人的生平

下村湖人是知名教育家兼小說家，他的長篇小說《次郎物語》是日本家喻戶曉的名著，深受日本讀者喜愛。此書自一九四一年出版以來，直至現在，一再重複出版，也發行過兒童版、青少年版、文庫版、漫畫版、全集版，並多次改編為廣播劇、電視連續劇、電影，也有中文譯本、英文譯本。而下村湖人的另一經典名著《論語物語》，自一九三八年出版以來，至今依然暢銷，已多次再版<sup>41</sup>，不但成為日本大學的指定用書<sup>42</sup>，出現不同譯者的數種中文譯本<sup>43</sup>，也有專文研究<sup>44</sup>。但是，一般讀者並不曉得下村湖人就是下村虎六郎，在日本殖民時期的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一年的六年間，曾經擔任「臺中州立第一中學校」<sup>45</sup>第三任校長（任期1925年6月至1928年9月），以及「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sup>46</sup>的第三任校長（任期1929年11月至1931年8月）。

下村湖人，本名內田虎六郎，佐賀縣人。父親內田郁二，母親ツキ。虎六郎排行第二，長兄平四郎。內田家是武士階級，父親的漢學造詣頗深，虎六郎自幼即被

<sup>41</sup> 戰後日本《論語物語》的流傳，參閱藤井省三：〈殖民地臺灣的下村湖人——文教官僚的挫折和教養小說作家的誕生〉，《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1卷第3期（2011年9月），頁171-177。

<sup>42</sup> 明治大學教授齋藤孝（1960-）指定《論語物語》為課堂用書，據說學生們深受該書內容所感動。齋藤孝：〈同時代感で甦る古典への誘い〉，《朝日新聞》，2008年8月18日。

<sup>43</sup> 臺灣學者林耀南譯：《論語故事》（臺北：協志工業，1967年）、李君爽譯：《論語平話》（彰化：專心企業，1976年）、王進祥譯：《論語故事》（臺北：國家出版社，1979年）。大陸學者孔繁葉譯：《論語故事》（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3年）。孔繁葉、栗強疏評：《論語故事心解》（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

<sup>44</sup> 松浦富士夫：〈《論語物語》研究〉，《高崎經濟大學論集》（高崎：高崎經濟大學，2000年）。劉萍：〈近代日本文學視野中的《論語》——以下村湖人《論語物語》為中心〉，《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7輯（2008年1月），頁206-219。劉萍：〈下村湖人と《論語物語》——「論語」を巡る日本の近代文学創作〉，河野貴美子、張哲俊主編：《東アジア世界と中国文化——文学、思想にみる伝播と再創》（東京：勉誠出版，2012年），頁305-324。

<sup>45</sup> 簡稱臺中一中，今國立臺中第一中學。參見《臺中一中八十年史》（臺中：國立臺中第一中學，1995年）。

<sup>46</sup> 簡稱臺北高校，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參閱蔡錦堂：〈日本治臺後半期的「奢侈品」——臺北高等學校與近代臺灣菁英的誕生〉，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2012年），頁313-327。



教導閱讀《論語》，奠定他的教育理念；母親喜愛短歌，影響他立志成為專業的歌人。由於母親體弱多病，虎六郎出生不久，便寄居乳母家，直到四歲才回家團聚。十歲時，虎六郎獨自陪伴重病的母親在娘家度過人生最後的半年。十二歲時，父親再婚。虎六郎就讀熊本第五高等學校<sup>47</sup>時，深受英文教師廚川白村<sup>48</sup>賞識，師生情誼醇厚；就讀東京帝國大學英文學科時，亦曾受夏目漱石<sup>49</sup>指導。虎六郎就讀五高時，由於長兄生病，父親生意失敗，一度決定退學，幸得佐賀縣當地資產家、貴族院議員下村辰右衛門的慷慨資助，才能順利完成學業。二十五歲帝大畢業後，本來想留在東京成為專業作家，因家境貧困，不得不返鄉工作，以奉養病弱的父親和繼母。不久，下村辰右衛門家道中落，虎六郎為報答經濟支援的恩德，二十九歲時入贅改姓下村，和辰右衛門的獨生女菊千代(1896-1945)結婚<sup>50</sup>。

下村虎六郎渡海來臺前，曾經擔任母校佐賀縣立佐賀中學英文教師、佐賀縣立鹿島中學校長和佐賀縣立唐津中學校長。擔任中學校長期間，熱心教學且發揮文藝長才，曾經為兩中學譜寫校歌，又因其行政能力強，深獲師生敬重，有「老虎」之稱，因而改以「下村虎人」作為筆名。下村從鹿島中學轉調到唐津中學擔任校長時，全校師生非常不捨而發起留任運動；而下村校長將轉調到臺灣時，唐津中學的師生、家長以及唐津市的市民都不捨得讓他離開，也發起留任運動。

一九二五年下村虎六郎攜眷來臺，擔任臺中一中校長。下村來臺的主因是，當時擔任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的後藤文夫<sup>51</sup>，認為林獻堂等臺灣仕紳設立的臺中一中，學生大多是民族情結濃厚的臺灣人子弟，教育管理問題相當棘手，於是委託熊本第

<sup>47</sup> 參見熊本大學五高紀念館網頁，網址：<http://www.goko.kumamoto-u.ac.jp/b01.html>。

<sup>48</sup> 廚川白村(1880-1923)，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畢業，評論家，英文學者。魯迅曾翻譯廚川著作《苦悶的象徵》。

<sup>49</sup> 夏目漱石(1867-1916)，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畢業，小說家，英文學者。曾任教於熊本第五高等學校、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

<sup>50</sup> 下村湖人生家保存會編著：《下村湖人生誕百二十年紀念——「大いなる道」》(佐賀：下村湖人生家保存會，2004年)。

<sup>51</sup> 後藤文夫(1884-1980)，大分縣人，熊本第五高等學校、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畢業。1924年9月至1928年6月，擔任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1930年擔任日本青年館、大日本連合青年團理事長。戰前歷任貴族院議員、農相、內務大臣、國務大臣，戰後任參議院議員等職務。參見張季琳：〈台中赴任のいきさつ〉，《台湾における下村湖人》，頁22-24。

五高等學校校友田澤義輔<sup>52</sup>推薦校長人選，而田澤推薦了下村。由於後藤和下村早逝的長兄內田平四郎是五高時期的同窗好友，且下村在佐賀縣立中學任教的評價很高，因此後藤同意聘用下村，下村便於一九二五年六月來臺<sup>53</sup>。

然而，一九二七年發生大規模的學生罷課事件。下村校長為平息紛爭，以強硬手段退學處分數十名臺灣學生。罷課事件後，臺灣總督府拔擢下村為臺北高等學校教授，一年後，下村榮升臺北高校第三任校長。一九二九年高校發生日本學生主導的罷課事件。事件後，下村為挽救因罷課而被退學學生的復學機會，且因總督府有意將其降調為文教局職員，因此憤而辭去校長職務。一九三一年下村虎六郎離臺，定居東京，加入田澤義輔領導的「大日本聯合青年團」，推行社會教育工作<sup>54</sup>。翌年一月，將筆名「虎人」更改為「湖人」。一九三三年下村湖人出版短歌集《冬青葉》<sup>55</sup>。一九三六年《次郎物語》開始連載於青年團的機關雜誌《青年》，一九四一年陸續出版合計五冊的《次郎物語》。一九三七年下村辭去青年團職務，專注於演講和寫作<sup>56</sup>。一九三八年出版《論語物語》。一九五五年下村辭世，享年七十一歲。一九六五年其著作《下村湖人全集》<sup>57</sup>出版，一九七五年再版<sup>58</sup>。

<sup>52</sup> 田澤義輔(1885-1944)，佐賀縣人，熊本第五高等學校、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畢業。戰前日本青年團運動的指導者。參見張季琳：〈田沢義輔との交友〉，《台湾における下村湖人》，頁 27-39。

<sup>53</sup> 後藤文夫：〈下村さんと田沢義輔〉，《人生》，1955年7月號，頁 73-74。本文後改題〈下村さんを偲ぶ〉，收入《一教育家の面影——下村湖人追想》（東京：新風土會，1956年），頁 1-3。

<sup>54</sup> 根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目錄查詢系統」資料顯示，下村湖人在臺期間，田澤義輔為指導臺灣青年團活動，曾數次來臺（冊號 10216，文號 72）。關於大日本青年團及臺灣青年團，參閱《大日本青年團史》（東京：日本青年館，1989年復刻版）。宮崎聖子：《植民地時期臺灣における青年団と地域の変容》（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08年）。陳文松：《植民地支配と「青年」：臺灣總督府の「青年」教科政策と地域社会の変容》（東京：東京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

<sup>55</sup> 關於下村湖人的短歌創作，參閱張季琳：〈下村湖人及其臺灣短歌〉，許雪姬主編：《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年），頁 275-309。

<sup>56</sup> 位於東京都小金井市的「空林莊」，是下村湖人就職「青年團」期間構思《次郎物語》的住所。2013年2月24日日本各大報社報導，小金井市的保護史蹟「空林莊」，於2月23日夜夜不幸被大火焚燬，起火原因不明。

<sup>57</sup> 下村湖人：《下村湖人全集》10冊（東京：池田書店，1965年）。

<sup>58</sup> 下村湖人：《下村湖人全集》10冊（東京：國土社，1975年）。

### 三、臺中一中的成立與罷課事件的發生

臺中一中是日據時期唯一臺灣人學生占大多數的中等學校。一八九八年臺灣開始實施中等教育，而最初的中學校是一九〇七年設立的臺北臺灣總督府中學校。因為這個學校只接受日本人子弟入學，所以臺灣的富裕家庭大多只能將子女送到日本內地，或海峽對岸的福建學校就讀。由於當時福建的中學大多是洋人經營的教會學校，對於總督府的臺灣殖民經營不是很有利，而臺灣本島人士也期待子女能和日本人子弟有共同就學的機會。因此，一九一二年林烈堂、林獻堂、辜顯榮、林熊徵、蔡蓮舫等有志之士，向總督府請願，要求設立臺灣人子弟的中學校。一九一五年「臺灣公立臺中中學校」獲准成立，這是第一個專為臺灣人子弟而設的中學，這個中學設立的經費與土地大多是臺灣人士捐獻，但由總督府掌控管理權<sup>59</sup>。一九二二年總督府改訂臺灣教育令，實施中等學校以上的臺日共學制。這一年，「臺灣公立臺中中學校」改稱「臺中州立第一中學校」。根據《臺中一中八十年史》記載，臺中一中從一九一五年設校到一九三〇年的十五年間，畢業生有六九二名，其中日籍學生只有十七名，可知臺灣學生是其主要成員<sup>60</sup>。

日據時期的差別教育，以日本學生為主的學校稱為第一中學，臺灣學生就讀的學校稱第二中學。例如，臺北一中（今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臺南一中（今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是以日本學生為主的學校。臺北二中（今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臺南二中（今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是以臺灣學生為主的學校。《臺中一中八十年史》記載，這時當局擬將臺中一中的校名更改為臺中「第二」中學，而將較晚設立，以日籍學生為主的臺中第二中學改稱「第一」中學。但是，當時小豆澤英男<sup>61</sup>校長堅決反對這種歧視措施，當局最終同意保留臺中一中的原有校名。

<sup>59</sup> 若林正文：〈總督府政治と臺灣土着地主資産階級——公立臺中中學校設立問題 1912-1915 年〉，《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東京：研文出版社，1983 年），頁 337-377。

<sup>60</sup> 〈臺灣光復前本校校長簡介〉、梁惠錦：〈臺中一中抗日罷課事件〉，《臺中一中八十年史》，頁 27、335-337。

<sup>61</sup> 小豆澤英男任職校長期間為 1919 年 6 月至 1924 年 11 月。「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目錄查詢系統」資料（冊號 2975，文號 24；冊號 3094，文號 36；冊號 3191，文號 42；冊號 3191，文號 60；冊號 3878，文號 17）記載，小豆澤是島根縣松江市人，生於 1878 年，松江中學校、第三高等學校、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學科畢業後，歷任佐賀縣立小城中學校教諭、山口高等商業學校教授、熊本第五高等學校教授、京都府女子師範學校校長、秋田縣師範學校校長等公職。

又，一九二三年四月，當時是皇太子的昭和天皇來臺灣巡視，在臺中一中校庭接見臺中州內各中等學校學生<sup>62</sup>。據說當時「臺中州立第二中學校」的校長認為二中學生大多是日本人，應該優先接受皇太子的垂詢。不過，小豆澤校長堅持應該公平對待臺灣學生和日本學生，結果依學校排名次序，讓臺中一中學生優先和皇太子見面<sup>63</sup>。如此，處處以臺灣學生的尊嚴作為優先考量的小豆澤校長，獲得臺灣學生的敬重，即使後來他離開了臺灣，凡是到日本留學的臺中一中的畢業生，都會去拜訪小豆澤，甚至參加他所主持的讀書會<sup>64</sup>。

由於臺中一中是由臺灣人民捐資創立，以臺灣學生為主的學校，學生民族情感較為濃厚，向來被當局視為問題學校。因此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小豆澤校長離職後，總督府總務長官後藤文夫費盡心思找尋適當人選，直到一九二五年七月，才派遣下村虎六郎來臺接任校長職務<sup>65</sup>。

不同於小豆澤校長，下村校長對臺灣學生的要求比較嚴格。例如，下村虎六郎校長一上任，立刻禁止學生在校內使用臺灣語。關於這件事，下村的長女明石晴代<sup>66</sup>曾撰文回憶，喜愛詩歌的下村校長，對於用詞遣句的要求比較嚴謹，但是自己的日語發音帶有濃厚九州地方腔的下村，卻嚴格要求臺灣學生必須正確使用日語，因此上任沒多久就引起學生反感。不過，一般而言，下村校長對臺灣學生也有一定程度的關心，主觀上是盡量以平等精神對待臺中一中的學生。例如，臺中一中第九期學生，臺灣知名畫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授陳慧坤(1907-2011)回憶，他是因為下村校長的鼓勵和支持而考取東京美術學校<sup>67</sup>。另外，臺中一中第一期畢業生許文

---

1919年6月30日，被任命為臺灣公立高等學校校長兼臺灣公立實業學校校長，1924年12月18日，以個人因素而辭職。另，筆者根據小豆澤英男：《神道と国民の自覚》（東京：越後屋書房，1943年）之「作者簡介」，得知小豆澤返日後，歷任二松學舍專門學校、上智大學、法政大學教授。

<sup>62</sup> 緒方武藏編：《臺灣大年表》（臺北：臺北印刷株式會社，1938年）記載，皇太子於1923年4月12日至16日來臺巡視約一星期。4月19日當天行程，包括新竹州廳、新竹尋常高等小學校、臺中州廳、臺中第一中學校。當晚於住宿處（臺中知事官邸），觀看市民提燈遊行和放煙火。

<sup>63</sup> 《臺中一中八十年史》，頁200。

<sup>64</sup> 同前註，頁27、133、200。

<sup>65</sup> 下村虎六郎任職臺中一中校長期間是1925年7月至1932年9月。

<sup>66</sup> 明石晴代：《次郎物語と父・下村湖人》（東京：勁草書房，1987年），頁82-83。

<sup>67</sup> 陳慧坤：〈我的藝術生涯〉，《臺灣美術全集》（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5年），卷17，頁34。陳慧坤：〈校友群英錄——陳慧坤訪談〉，《育才大道》（臺中一中校友會）創刊號（1998年12月）。

葵（本名許媽葵，1899-？，鹿港人，鹿港詩社社員），曾任臺中州通譯、福興莊莊長，臺灣光復後，擔任臺中市省立一中教員、訓導主任和舍監。一九二〇年夏天，日本文豪佐藤春夫(1892-1964)來臺旅遊時，許文葵奉命擔任佐藤的翻譯，並陪同佐藤訪問林獻堂。後來佐藤春夫將其旅遊臺灣三個月的經驗撰寫成著名小說《女誠扇綺譚》，文中的「世外民」，就是許文葵。臺中一中罷課事件爆發經過三十二年後的一九五九年，當時在母校臺中一中擔任教員的許文葵，在其主編的《臺灣省立臺中一中校友年鑑》中，對於下村湖人有如下評價：

下村虎六郎校長，乃一中大罷課時代之「劊子手」，然受其薰陶者，都云，下村不失為一熱心教育家，英文造詣亦不錯，自擔任考試班之英文——然則見仁見智，下村固不能直視為一中之罪人也。<sup>68</sup>

儘管如此，下村校長的善意並未能完全傳達給臺灣學生，就結果而言，他被大多數的臺灣學生所憎恨。這可能也和他道貌岸然的外型、嚴肅的個性有關，甚至和「虎六郎」這個令人生畏的名字也有關。

下村校長就任後的第二年，一九二七年五月，爆發了「臺中一中罷課事件」。根據《臺中一中八十年史》記載，下村虎六郎校長為袒護學生宿舍的日籍廚師夫婦，無視其欺負臺灣學生的事實真相，將警察暴力導入校園，以退學的強硬手段，處分抗議的數十名臺灣學生，以致成為學生們厭惡痛恨的對象。臺中一中第十四期生（1926年4月入學），曾任臺中第一屆縣議員的陳亭卿(1914-2008)一九九八年接受校友訪談時，對於罷課事件的經過有如下敘述：

我今年八十五歲，公元一九一四年生於臺中縣龍井鄉新社大肚山頂的農家，回憶一九二六年入臺中一中，在當時刊登名單於報紙，是轟動全臺的事。因為十名考生中只有一名上榜，如昔時考秀才一般。當時的一中初中部加高中部超過五百多人，多數的外地生住在學寮裏，在日據時代學寮還承襲著傳統的學長學弟制，換句話說即是以軍事管理，由上級生管理低年級生的自治制度，但由於大家對民族有強烈的熱愛，因此彼此相親相愛，團結自強，學長學弟彼此間有血濃於水、像兄弟一般的感情。在當時，臺中一中是唯一由臺灣人自己創辦的學校，如今的建國中學和臺南一中，雖同為創校歷史悠久的

<sup>68</sup> 許文葵：〈螢窗夢痕〉，許文葵主編：《臺灣省立臺中一中校友年鑑》第2號（1959年8月），頁b2。

學校，但在當時幾乎全為日本人的學子，臺灣學生進去均受到許多不公平的待遇和排擠，所以臺中一中的學生，對民族精神有格外的感觸。

〔校長下村虎六郎〕無視學寮學生自治會的要求，不肯撤換宿舍管理職員「中村」。他是三百多學生伙食管理的炊事長，因伙食中時有發現不潔髒物，衛生管理不良，要求撤換職員「中村」。結果不但不被校長接納，還強硬不認他有疏失，向學生故意顯出偏護日人職員的權威，不肯接納學生自治會之要求。經數次談判無效，於是高年級領導學生，提出發動「罷課」之議，以表示抗議，得到大多數學生的贊同。五月初的一天早上，天未明，一批一批的學生以軍事訓練的模式，偷偷從宿舍的後門溜出去，下鄉回家了。那天起全校五百多名的學生溜了三百多人，住在臺中市及近郊的學生，看到學寮學生沒上課，他們一了解此事由來，就跟進一個一個罷課回家了。翌日報紙出了「號外」，特別報導此事於全臺灣，致使不單臺灣全日本官民上下為此事件驚愕。學校當局報上臺中州廳「州知事」，學生自治會報上家長會長及林獻堂先生<sup>69</sup>，由家長會出面，與學校當局和州廳接洽談判，達兩星期之久才解決。

雖然解決了，但學校方面只撤換了炊事長「中村」，舍監被記過了事，學生方面犧牲重大，被退學、停學處分的約達六十多名之多。殖民地政治的權勢壓迫，使學生和家長感覺到大大不滿，可是無可奈何，吞淚忍受他們的措置。此事是學生一次的大洗腦，使他們知道統治與被統治的滋味，對統治者日人政府反抗意識衝擊至深，雖然是很有團結、有規律的抗議行動，結果是一敗塗地。<sup>70</sup>

同樣第十四期生，臺灣知名作家巫永福(1913-2008)生前寫給筆者的信函說：

當時下村校長非常嚴酷，被退學的學生相當多，這是臺灣教育史上的一大事件。

第九期生(1922年4月入學)，臺灣前副總統謝東閔(1908-2001)先生，生前寫給筆者的信函則說：

<sup>69</sup> 筆者案：林獻堂於1927年5月12日啟程至歐亞各地旅行一年，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欠缺1927年3月21日至5月8日的內容，無從確認當時林獻堂是否知道罷課事件的發生。

<sup>70</sup> 陳亭卿：〈校友群英錄——陳亭卿訪談〉，《育才大道》創刊號(1998年12月)。

關於炊事事件，我略有所知，那是當時的臺灣同胞因受到歧視待遇而奮起抗議的事件。

這個事件的起因是學生宿舍餐廳的主廚個人不誠實的行為，卻演變成學生、家長和畢業校友，甚至臺灣民族運動人士的矚目，而以各種形式對臺中一中學校當局展開抗議行動。雖然報章雜誌的報導不能完全斷言就是事實，不過，經由這些報導大致可以知道臺中一中罷課事件的真相。至少從當時《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民報》等相關資料，可以看出罷課事件和殖民地教育體系中的民族歧視問題，有不可分的關連。以下從臺灣總督府御用報紙《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追溯事件的經過。

#### 四、《臺灣日日新報》對於罷課事件的報導

《臺灣日日新報》是一八九六年創刊的《臺灣新報》與一八九七年創刊的《臺灣日報》，於一八九八年合併而成。一九四四年《臺灣日日新報》與其他五家報紙合併為《臺灣新報》，是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發行的最大報刊，出刊期間長達四十七年。內容以日文為主，另設有小篇幅的漢文版<sup>71</sup>。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二日，《臺灣日日新報》首次報導臺中一中罷課事件：

〔臺中電話〕臺中第一中學校寄宿生等，於本月初發起炊事長之排斥運動，五年級生五十一名為發起委員，脅迫校長開除炊事長等，據說因沒有明確答案，學生們進一步準備發動罷課。學校當局得知後，匆忙於十一日午後三點左右，在校內召開家長會說明善後處理措施。據說事情起因於學生們到廚房索取砂糖，廚師態度不好，不給糖，因而引發孩子氣的反感。<sup>72</sup>

根據這個報導，罷課的直接原因是學生在廚房得不到砂糖。其實寄宿學生與日本廚夫發生衝突，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臺灣日日新報》「孩子氣的反感」的看法，未免過於膚淺及偏袒。

由於宿舍是採取學長管理制，因此抵制日本主廚運動雖然是由五年級學生發動，不久就波及三、四年級學生，進而發展為一大事件。五月十四日《臺灣日日新

<sup>71</sup> 鍾淑敏：〈館藏《臺灣日日新報》的史料價值及其利用〉，《館藏與臺灣史研究論文發表研討會彙編》（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4年），頁137-155。

<sup>72</sup> 〈臺中一中寄宿舎の炊事長の排斥運動子供らしい反感から〉，《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5月12日。

報》報導，許多住宿生離開宿舍，這時一、二年級的住宿生大多還留在宿舍，而總督府文教局開始注意罷課事件的發展<sup>73</sup>。五月十五日《臺灣日日新報》刊載了某文教局官員的談話。該文教局官員說，臺中一中向來是很難管理的學校，認為罷課事件只是群眾心理的輕舉妄動而已，主張學校當局應該要採取強硬手段<sup>74</sup>。但是罷課事件並沒有就此平息，十四日當天二年級住宿生也離開了宿舍。這時學校宣布所有離開宿舍的學生全部勒令停學，同時準備召開家長會。五月十五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這些參加罷課的學生不只是逃離宿舍而已，他們相互聯絡，協議繼續抗爭<sup>75</sup>。另一方面，臺中一中的畢業校友開始憂慮事件的發展，決定十六日下午召開校友大會，十七日召開學生家長大會<sup>76</sup>。五月十六日《臺灣日日新報》刊載校友大會的公告如下：

「臺中第一中學出身者大會招集通告」

我母校在校生因學寮微事，惹起同盟罷校，事前臺中近在諸校友往訪學校當局，協議善後，終不得要領，而事件有漸擴大之兆，殊深遺憾。茲為協議善後策起見，準照左記條項開催第一中學出身者全島大會，屆時校友諸位務期撥冗與會，以盡天職，無任懇禱。

一、時期 五月十六日午後三時

二、場所 臺中公會堂

事務所置在臺中市橋町四丁目二十九番地 鄭松筠辯護士 近隣

昭和二年五月十四日

臺中第一中學出身者有志公啓<sup>77</sup>

根據這個公告的內容，居住在臺中附近的校友已經和學校負責人談過話，卻「不得要領」，而不得不召開會議。校友大會的決議有三：（一）對於母校的學生罷課行動深感遺憾；（二）追究學校當局令事件惡化的責任，下村校長應引咎辭職；（三）

<sup>73</sup> 〈三年以上の學寮生全部一昨夜密かに脱寮、學校側は昨日臨時休校の上対策を協議、百七十九名に無期停學、臺中一中の學寮騒動擴大〉，《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5月14日。

<sup>74</sup> 〈群眾心理にかられ、輕舉盲動するは學生の一弊風、斷乎として矯正する必要がある＝某當局談〉，《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5月15日。

<sup>75</sup> 〈臺中一中學寮騒動益々擴大、更に在寮二年生六十七名脱寮、學校側直ちに無期停學處分、通學生にも波及せん〉，同前註。

<sup>76</sup> 〈臺中一中盟休問題卒業生大會父兄大會等開か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5月16日。

<sup>77</sup> 〈臺中第一中學出身者大會招集通告〉，同前註。



讓全體學生一律返校，並承認其正當性<sup>78</sup>。至於十七日召開的家長會議的情況，《臺灣日日新報》的日文版沒有任何報導，直到五月十九日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簡略報導了家長大會選出臺灣人擔任議長，但是沒有說明會議內容<sup>79</sup>。五月二十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有多位家長寫信向下村校長致歉，懇求早日解除無限期停課的懲罰，讓學生早日返校復學<sup>80</sup>。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以下這則報導：

〔臺中電話〕因臺中一中問題，於十二日召開家長會之際，以學生家長身份臨會的南投郡草屯陳深切（二六），未經許可，擅自在校糾集宿舍學生，恫嚇學生，進行暴力行為。因此，於臺中署接受審訊，十九日依妨害公務執行，移送臺中法院。<sup>81</sup>

「陳」深切，應該是指「張」深切。《臺灣日日新報》對於五月十二日的家長會沒有任何報導，這個在五月十二日舉行的家長會，是臺中一中教職員也出席參加的，和十七日的家長會是不同的。

罷課事件發生已經過兩個星期，學生們還是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復學。五月二十五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有一部分離開宿舍的學生威脅通勤學生加入罷課運動。同時報導，有部分家長在二十四日召開會議，二十五日下午兩點面見臺中州三浦知事（即今市長），要求讓學生復學被拒。五月二十六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二十五日下午五點，學校公布退學處分十名學生，二百四十餘名學生無限期停課<sup>82</sup>。如此嚴苛的懲罰手段，讓學生和家長們更為憤慨。

五月二十七日《臺灣日日新報》以「一中當局英明果斷」的大標題，報導許多學生在家長陪同下，向學校當局謝罪並申請復學；也有被退學的學生和家長一起到校，聲明自己並未犯錯不該受此懲罰；另有被退學學生打算到東京留學<sup>83</sup>。

六月四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學校堅持學生須有家長陪同到校，才能申請

<sup>78</sup> 〈學校當局の責任を問ひその引責を期す 臺中一中卒業生大會〉，《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5月17日。

<sup>79</sup> 〈臺中一中父兄大會在佛教會舉行〉，《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5月19日。

<sup>80</sup> 〈臺中一中事件無期停學者中反省した者には不日登校を許す〉、〈善良な生徒は困る一日も早く就學したい、某有力者談〉，《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5月20日。

<sup>81</sup> 〈暴行煽動者法院送り〉，同前註。

<sup>82</sup> 〈不良學生十名を退學處分、臺中一中當局昨日發表〉，《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5月26日。

<sup>83</sup> 〈飽く迄理非を正す一中當局の英斷、陳謝して復校を願ひ出づるもの續出〉，《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5月27日。

復學，已有八九成臺灣學生陸續復學報到<sup>84</sup>。《臺灣日日新報》完全無視臺灣學生的感情和立場，始終支持下村校長及學校當局，甚至大力讚揚學校當局對臺灣學生的嚴酷懲處，是英明果斷的措施。六月一日的社論<sup>85</sup>，更露骨表明「本島教育向來過於討好學生」，可以看出當時在臺的日本人，尤其是文教關係人士，對臺灣人民所持有的態度為何。臺中一中罷課事件似乎在臺灣各地也引起迴響。例如，下村的友人樋口孝的回憶文章記述：「當時我雖然是嘉義農林校長，仍然受到臺中一中罷課餘波的影響，學生宿舍的秩序也變得大為混亂。」<sup>86</sup>而當時肯定下村校長措施的，似乎並不是只有在臺日本人而已，也有署名張金水的讀者投書，鼓勵下村校長掃蕩「不良」學生<sup>87</sup>。

六月七日《臺灣日日新報》刊載了下村校長的訓詞<sup>88</sup>，並報導被勒令無限期停學的學生在六月六日幾乎都已獲准返校。但是，罷課事件並沒有就此完全落幕。六月十一日起《臺灣日日新報》連續三天報導，學生返校後，對於學校仍有不滿，深夜故意在宿舍內吵鬧，或放鞭炮，或吹喇叭，或用石頭襲擊舍監房間的玻璃，或集體缺席數學課和英文課等<sup>89</sup>。下村校長趕來宿舍訓誡時，學生們各個低頭，一語不發，但是校長一離開，學生就開始破壞行動。結果又有二十一名臺灣學生，因此而被退學<sup>90</sup>。六月十六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十四日早上，三年級全體學生聯合蹺課，

<sup>84</sup> 〈陳謝して来ねば断然たる措置、復校を願ひ出る者も少くない、臺中一中盟休事件〉，《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5月30日。〈臺中一中停學生復校者續出、學校側は父兄を同道せねば復校を許さぬ〉，《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6月2日。

<sup>85</sup> 〈直接行動さへ採れば何でも通る、この悪習を作らぬやう頑張る臺中一中校長〉，《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6月1日。

<sup>86</sup> 樋口孝：〈ストライキ頻発〉，《一教育家の面影》，頁25。

<sup>87</sup> 張金水：〈不良學生を掃蕩せよ〉，《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5月27日。

<sup>88</sup> 〈生徒側の謝罪で圓滿に解決、臺中一中盟休事件〉，《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6月7日。

<sup>89</sup> 〈自習時間中突如消燈、喊聲を擧げて舍監室を襲ひ、言語に絶する大亂暴、人を喰つた臺中一中復校生、學校側最後手段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6月11日。〈十日夜も舍監室を襲ひ無茶苦茶に暴行、手がつけられぬ臺中第一中學寮生、附近の者何かと戶外に飛出す〉，《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6月12日。〈夜になると騒ぎ立てる臺中一中學寮生 學生にあるまじき卑劣さに心ある者を蠶蹙さす〉，《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6月13日。〈不穩な唱歌硝子を破る音鯨波の聲が間斷なく交錯、物凄いオーケストラの演奏が一時間も續いた、臺中一中學寮〉，《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6月14日。

<sup>90</sup> 〈臺中一中學寮事件、遂に二十一名を退學處分、屁とも思はず退寮する彼處分者、寮内は破屋

不出席英文課，因此又有五名主導學生被開除學籍<sup>91</sup>。

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有關臺中一中事件的報導內容，和日文版幾乎相同。偶爾也有消息是日文版未刊載，只有漢文版報導的。例如，八月九日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晚報）刊載八月七日臺中一中校友會的會議情形。根據這個報導，校友表決通過下村校長的不信任案，決議罷黜臺中一中校友會會長下村虎六郎，改選張聘三為新任會長。下村校長盛怒之下，高聲宣布解散校友會議，然後帶領所有教職員離席。這時全體校友大喊：「校長霸道、蠻不講理。」<sup>92</sup>

整個臺中一中罷課事件的紛擾，持續延燒到八月，終於告一段落<sup>93</sup>。其實早在六月十五日，《臺灣日日新報》有篇長達二千多字的社論，相當值得注意<sup>94</sup>。如果臺中一中學校或文教當局注意到這篇文章，能稍微虛心接受第三者意見的話，事件或許不會演變至此。《臺灣日日新報》自罷課事件發生以來，完全支持下村校長為首的學校當局的所有決策，報導中凡是敘述臺灣學生的用詞遣句，大多充滿不屑和惡意攻訐。但是這篇社論的作者卻極力主張，民間有力人士和政府當局應介入協調，認為應該委託臺中一中校友會協助調解問題。作者也再三提醒學校當局，應該傾耳聆聽學生方面的主張。作者認為事件的近因雖然是本島學生不滿廚夫的行為，但是這種住宿學生對餐廳有所不滿的情形，在日本內地並不是什麼稀罕的事情，作者強調這種不滿情緒在臺灣很容易和差別待遇的民族意識相結合。作者認為如果不盡力減低這種差別待遇意識的話，就很難促成真正的內（日本）臺融合。作者認為學校當局在某種程度上，應該做某種妥協，讓臺灣菁英的臺中一中學生保有尊嚴，不失體面，學校單方面「斷然果決的處置」、鎮壓臺灣學生，並不能真正的解決問題。也就是說，社論的作者是間接地批判了下村虎六郎校長的行政無能以及頑固專橫。

---

同樣），《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6月14日。

<sup>91</sup> 〈臺中一中三年生又五名退學 英語の時間盟休を煽動して學校側は最後の一人迄不良學生掃蕩〉，《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6月16日。

<sup>92</sup> 〈臺中一中同窓會鬧得不成體統、提出會長不信任案〉，《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8月9日（夕刊）。是否當時臺中一中校友會規則賦予校長極大權限？不得而知。筆者至今未能看到戰前校友會會規。

<sup>93</sup> 〈臺中の一中に復も學校騒動、更に二十名退學、生徒側善後策を協議〉，《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8月5日。〈廿名の退學生は事件勃發以來登校せぬ學生、下村校長談〉，《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8月6日。

<sup>94</sup> 〈民族心理に觸る紛擾——その調停は地方官民の義務〉，《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6月15日。

## 五、《臺灣民報》對罷課事件的評論

以上透過《臺灣日日新報》的相關報導，大致瞭解臺中一中罷課事件的經過，由於該報具有臺灣總督府官報的性格，內容大多是追認學校方面的措施，因此想瞭解陷入該事件漩渦中的臺灣學生、家長和校友們的動向或心情，有必要仔細閱讀日據時期臺灣人唯一發聲的週刊《臺灣民報》<sup>95</sup>。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出刊的一五九號《臺灣民報》，以〈臺中一中學生罷學的真相〉為題，詳細報導罷課事件<sup>96</sup>，內容敘述事件的起因在於主廚中村夫婦以及舍監的不誠實，文中並公開主廚和舍監的真實姓名，這是《臺灣日日新報》完全不曾言及的。根據臺灣民報社獨家調查完成的這篇報導，臺中一中學生宿舍餐廳中村主廚在事件發生前三年就入宿舍工作，日本人舍監與學生代表商議讓中村外宿的妻子也搬進宿舍，但必須遵守三項規定：（一）以無薪資工作換取三餐；（二）須吃學生吃剩的飯菜；（三）若與學生意見不合，隨時可命其離開。但是，中村之妻入住後完全不遵守約定，還帶了四、五個小孩一起住進宿舍，吵鬧不堪影響學生的生活作息。因此中村之妻常與學生發生衝突。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九日，中村之妻明知蓮藕粉裏有老鼠屎，卻不事先告知臺籍伙夫，等他將老鼠屎混入菜內，才告訴學生不可以吃。因為中村之妻存心不良且違反約定，所以學生要求將她趕出宿舍。當時秀島、鹿股兩日人舍監態度惡劣，不但拒絕學生的要求，還說：「你們若要鬧事，只管去鬧，與我卻無相干。」<sup>97</sup> 學生們更加憤慨。

對主廚和舍監的態度感到憤怒的室長和寮長等幾位住宿學生於五月四日，連署提出辭呈。下村校長不但沒有慰留還立刻受理辭呈，並召集所有住宿學生訓話，且提出三項禁令：

（一）自本日起停止學寮的自治。

<sup>95</sup> 《臺灣民報》，臺灣人於1923年4月在東京創辦的半月刊，後改為週刊，其前身是《臺灣青年》、《臺灣》，後改名《臺灣新民報》，該報勇於批評時政，對日據時期臺灣的社會運動有重大影響。戰爭時期被迫改名《興南新聞》，後被合併為《臺灣新報》。引自《臺灣歷史辭典》，頁1149，蔡說麗撰稿「臺灣新民報」詞條。

<sup>96</sup> 〈臺中一中學生罷學的真相：校長爲要擁護一個內地人炊夫 威壓二百餘寮生全部退寮 父兄及出身者已一致憤起抗議了〉，《臺灣民報》第159號，昭和2年5月29日，頁5-9。

<sup>97</sup> 同前註。

(二) 不問任何理由，停止學生一切的發言權。

(三) 本日以後，寮生要絕對服從舍監。<sup>98</sup>

不論是什麼理由，禁止學生所有的發言權，必須絕對服從舍監的這種訓誡，實在令人很難想像這是以自由主義的教育家出名的下村湖人的話語。

五月六日下村校長又召集學生訓示，說明只要作為校長在任一天，絕對不會將主廚中村夫婦趕出宿舍，如果學生們不服從的話，校長自有「處罰」的「寶劍」在手。因為極度誇耀自己的權威，學生們的憤怒達到極點。五月七日下午，下村校長親自住進宿舍監視學生的行動<sup>99</sup>，讓學生大為反感。五月八日夜晚，因為有住宿生燃放鞭炮，第二天校長再度召集學生，詢問燃放鞭炮的理由以及是否有煽動者。五月十一日召開家長會。

《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幾乎略過家長和畢業校友的動向，但是《臺灣民報》對於臺灣學生的家長和畢業校友的動向，則有詳細的報導。根據〈臺中一中學生罷學的真相〉這篇文章的內容，得知十一日的家長會議，是透過警察之力，逐家挨戶，彷彿召喚刑事被告人般，一一召集而來的。這個會議上，雖然有很多家長道歉賠罪，但是學校並不改變強硬態度，最後家長們也對校長等人的態度感到氣憤，於是在毫無共識下家長會議就解散了。當晚學校的軍事教官蒙面隱藏在樹影下，而警察隊和憲兵隊則包圍學校，彷彿是征伐盜匪的巢穴一樣的緊張情勢。罷課期間居住在臺中附近的畢業校友們開始努力斡旋，十二日畢業校友代表會見下村校長，說明住宿學生為找尋租屋，至少需要三天時間，拜託給予延期三天的退宿寬限期。下村校長不但拒絕畢業校友所有的提議，還禁止他們和住宿生見面。畢業校友每次拜訪學校，校長和教職員一看到他們，就好像見到仇敵般，態度非常粗野無禮。五月十二日夜，下村校長又召集住宿的五年級生，命令必須在隔天（13日）早上五點前，全部搬出宿舍，明確說出如果不按時遷出，就要借助警察權力強制執行。十三日清晨兩點左右，同情五年級學生遭遇的四年級、三年級的住宿生也流著眼淚一起退出宿舍。這一百七十多名住宿生的家都離市區很遠，暗夜裏只能默默地扛著個人的行李，毫無目的地在街上徘徊。十四日清晨，二年級的住宿生也全部離開了宿舍。相較於《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幾乎一律指稱離開宿舍的學生是「不良學

<sup>98</sup> 同前註。

<sup>99</sup> 同前註。

生」，《臺灣民報》則站在學生立場，較多同情的報導學生離開宿舍的悲慘情形，兩者的報導有相當大的差距。

事件的影響愈來愈大，十四日臺中有力人士吳泗滄、鄭松筠、陳朔方、盧安等人拜訪下村校長，希望能圓滿解決事件。但是校方的回答極為冷淡，主張為了保持學校的威嚴，不能輕易妥協。到了十五日，全校通勤的學生自動集會，決議向校方提出三點要求：（一）無條件讓住宿生回到宿舍，（二）絕對不能有犧牲者出現，（三）校方應該承認通勤學生會的存在。但是校方完全置之不理。至此，畢業校友無法繼續坐視不管。五月十六日張汝燥、張煥奎、張奎三、魏崧、林朝杰等人，於臺中公會堂召集五十六名臺中一中畢業校友開會。報告事件經過後，自由討論善後措施。所有與會者都譴責下村校長的蠻橫和中村主廚的不誠實行為。這次會議有三項決議：

- （一）以這回母校學生的同盟罷校為憾事。
- （二）追問使事件惡化的學校當局的責任，期其自省。
- （三）以學生全體迅速的復校為正當。<sup>100</sup>

這份決議書還附有長篇的〈理由書〉說明事件的經過，並指出導致事件惡化的責任在於學校當局，要求校方取消停學處分，讓所有學生都能回校上課。十六日下午，《臺灣民報》記者到臺中一中調查事件真相。由於校長正在開會，須等待一個小時左右才能見面。因此，記者要求參觀學生宿舍餐廳。於是在舍監的帶領下，記者親自看到了宿舍餐廳，確認餐桌和餐具都非常不乾淨。之後，記者被帶到校長室，卻被告知只能和校長談話十分鐘。以下引用當時校長和記者的問答紀錄，內容雖然較長，卻可以瞭解下村校長的態度。

記者：貴校這回的罷學風潮是很遺憾的事，本日特來探訪其經過及以後的解決方針。

校長：罷學的原因是要罷免炊夫的問題而起，但是中村（炊夫）已經自三年前就入寮，一時要罷免他，未免於情太過，又且炊夫的罷免關係人事，是一任舍監就是，不該學生插嘴干涉，雖然事小，作一前例，成為學生模仿的好樣，是不行的。故此是不得許可的，意思是待以後有適當的機會才要設法。

<sup>100</sup> 同前註，頁7。

記者：學生這樣的要求，學校當局認定如何？

校長：學生的要求確實很有道理，但是若即刻就照要求處辦，恐怕學生動不動就再出過分的要求，故此不得應的。

記者：倘若認定在學生的要求有理，何不照理容納，一來可以圓滿解決，二來可以使學生得著訓練的機會，也可作判斷是非的準繩，若是不管是非，一切抑制，豈不是違背教育的精神？

校長：不答。

記者：燃放爆竹是什麼意思？

校長：不知道什麼意思，總是不得看作是兒戲，是非常危險的事。

記者：這回的事似乎全把責任掛在五年生，但是為何三、四年生也出同一行動？

校長：主謀雖在五年生，但是三、四年生也同盟在內的。

記者：關於命令退寮的事，校友有來請緩三天，校長何故不許？

校長：已經為父兄緩了一天了，因為恐怕再在寮內鬧事，故不得允許的。

記者：校長既說要罷免一個入寮三年的炊夫，是學生不近人情，那末對在學五年的多數學生請緩三天也不許，豈不更沒有師弟之情？

校長：不答。

記者：學生退舍後，學校即刻就命無限期停學，出這斷案之前，先招父兄，再講善後的方法，豈不是更妙？

校長：學校是認定這樣的處分為正當，倘若再招父兄，是太費事，又太過不敏捷。

記者：豈不是因為學校的態度過於無情，以致二年生也罷學，聽說通學生也參加了？

校長：總而言之，在學生間此風是不可長的，所以勿論如何，都有嚴重對付的覺悟。

記者：那末想要出多少的犧牲，才得解決呢？

校長：看看他們的行動如何，如有不遜的，那就是不得已。

記者：然而這回事件本是很簡單可以解決的，弄到這個田地，責任豈可全掛在學生身上嗎？學校當局豈沒有相當的反省？

校長：現在有很慎重地研究善後對策，想於最短期間使他們復校。

記者：那末現在所定的具體的辦法如何？

校長：現正在研究中，還沒有具體方案可以明確回答的。<sup>101</sup>

從記者和下村校長的問答可以看出，校長大致承認罷課事件起因於中村廚夫，卻堅持不能將他免職，又說學生不應干涉人事問題。至於中村主廚夫婦與舍監之間，為維護同是日本人利益的腐敗關係，至於如何傷害了臺灣學生純潔的心靈，則完全不予理會。

《臺灣民報》第一六〇號報導，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下午，留學東京的臺中一中畢業校友約一百名，集結在明治神宮外苑的日本青年會館<sup>102</sup>，召開「留京臺中一中出身者大會」<sup>103</sup>。這會議的決議文有三：（一）無論是退學或停學處分的全體學生，應該無條件復學；（二）學校當局負責人應該引咎辭職；（三）校方應該承認學生自治會，並答應他們的所有要求。六月一日畢業校友代表到臺灣總督府駐東京出差館，陳述本次罷課事件真相，將決議文提交臺灣總督。《臺灣民報》第一六一號專欄「臺中一中事件之反響」刊載了臺中一中住宿生的宣言如下：

吾等二百六十餘名學生，受過曠世之奇辱，此恨未報，永不能相離。夫殮膳混以鼠糞，猶強挽留廚夫者何哉！及見全寮生之公憤，乃率兵隊以威嚇。嗚呼！其狂態若是，我敬愛之良師，對於教育事業前途，將作如何感想乎？如召我父兄以警官，其暴戾非道，可謂極矣！魂血既鬱勃，吾等終不能沉默，惟有群起而彈劾之！<sup>104</sup>

《臺灣民報》第一六〇號也刊載了署名「在東京臺灣文運革新會」團體發表的宣言〈關於臺中一中總罷校事件訴諸全臺灣學生大眾〉，因為當局的檢閱，這份宣言有許多文字都被塗黑或刪除，但是現存《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仍保有該宣言約七百字的日譯文<sup>105</sup>。《臺灣民報》第一六三號，以〈臺中一中問題和下村校長〉的標

<sup>101</sup> 同前註，頁 8-9。

<sup>102</sup> 1925 年 10 月正式開館的日本青年館，是大日本聯合青年團建設的活動據點。日本青年團的指導領袖是田澤義輔，他是下村湖人在熊本第五高等學校、東京大學的學長，是下村湖人的摯友。參閱張季琳：〈九州から台湾へ〉，《台湾における下村湖人》，頁 27-39。

<sup>103</sup> 〈留京臺中一中出身者大會、爲講究臺中一中罷學解決案〉，《臺灣民報》第 160 號，昭和 2 年 6 月 5 日，頁 4-5。

<sup>104</sup> 〈臺中一中之反響〉，《臺灣民報》第 161 號，昭和 2 年 6 月 12 日，頁 10-11。

<sup>105</sup> 〈臺中一中總罷校に關し全校生大眾に訴ふ〉，《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頁 231-232。



題，批判「下村校長不是教育家。他是殖民政策下的教育警察官」、「他的民族偏見已經病入膏肓」、「學校當局知恥的話，應該引咎辭職」<sup>106</sup>。同號也刊載了 S. M. 生文章〈主客顛倒的怪現象〉，認為臺中一中的狀況「不只是以教職員為主體和學生對峙而已，一個主廚為主體壓迫學生」<sup>107</sup>。同號「小言」欄，標題〈師弟鬪爭的惡風〉的文章批評：「下村校長只有寶劍，欠缺仁德，破壞臺灣教育風氣。」<sup>108</sup>

一時看似沉靜的罷課事件，因學生深夜的吵鬧而增加糾紛，更多的學生遭受退學處分。第一六五號《臺灣民報》刊載了長文〈臺中一中罷學的經過及結果〉<sup>109</sup>。這篇文章裏不但記錄退學處分的學生人數，也刊出被處分的學生名單。根據這篇報導，有數十位學生非常憤慨學校的霸道行為與冷酷，而自行決定退學。到了七月，臺中一中表面似乎恢復了平靜，但是至少有五十名退學生不再復學。而下村校長始終沒有改變其強硬的態度，沒有反省自己和學校方面的責任，就這樣擺脫了困境。《臺灣民報》第一六五號的評論〈學生的罷學及學務當局者的責任〉，認為臺中一中罷課事件的罪魁禍首是學校當局，這是由絕對的師權和民族感情所誤導的結果：

#### （一）師權絕對

因為一中的校長是曾作過軍人的，在軍隊裏對下卒慣發絕對服從的校長，對學生也是抱著師權絕對的思想，全然無視學生的自由和自治，所以一聞學生提出要求，就責罵說不守學生的本分。試問在學生自治學寮裏要求罷免炊夫，這毫有過分呢？軍隊是要做戰爭的工具，然而學生是將來要在社會自由活動的，因為他拿學生的教育誤作軍隊的訓練，又誤將軍令的絕對適用作師權的絕對所致的。這是自由思想發達、自由教育盛行的今日的一個時代的錯誤。

#### （二）民族感情

不但是為著誤奉了師權絕對，並且又有抱了更利害的民族感情，為著要求的是臺灣學生，而對手是日本人廚夫，所以就不肯容納臺灣學生的要求去罷免日本人廚夫。倘若要求的學生和要罷免的是反對的時候，就沒有問題了，也

<sup>106</sup>〈臺中一中問題と下村校長〉，《臺灣民報》第 163 號，昭和 2 年 6 月 26 日，頁 12。

<sup>107</sup>〈主客顛倒的怪現象〉，同前註，頁 13。

<sup>108</sup>〈師弟鬪爭的惡風〉，同前註，頁 7。

<sup>109</sup>〈臺中一中罷學的經過及結果：學校的態度依然無誠意，復校後騷鬧罷課續起，退學了學生數十名〉，《臺灣民報》第 165 號，昭和 2 年 7 月 10 日，頁 4-7。

必沒有為袒護一個廚夫而使學生罷學，終致生出數十名的犧牲者，視一個廚夫的飯碗比數十名學生的前途更重要，這不是出自民族感情，試問更有何可辯解呢？政治家抱著民族感情都不得了，何況在於教育者也用直觀教育法去鼓吹民族意識，這豈不是錯誤極了嗎？<sup>110</sup>

這裏所說的民族感情是指民族差別的感情。《臺灣民報》第一六五號〈對臺中一中罷學問題的批判〉，刊載了二十四位臺灣人民的感想，其中幾篇評論如下：

此回臺中一中罷學，是開臺以來期間第一長久的，又出犧牲者第壹多數的。但其原因不過是為民族的優越感所支配，擁護一炊夫起見。

近來臺灣官憲最怕的，便是臺灣人的發生強大的民族意識。然而他們全不治內地人的差別待遇，只求民族意識的消滅，這層卻比緣木求魚的更難了。我們拿《春秋》的筆法來說，臺中一中的學潮，乃是學校當局者倒在鼓吹民族意識的好例吧了。

為袒護一個罪惡貫盈的廚夫，犧牲了數十名活潑有為的青年，真是很可傷心的。廚夫的明目張膽，已是難堪，那教育者也抱民族偏見，初則裝聾作啞不採納學生的話，繼而責罵、欺辱、恫嚇、迫逐……無所不用其極。監督者也是同一鼻孔出氣，不肯公平收拾。日刊報紙更是鑿孔栽鬚、離間、呪詛、誣謗、罵得淋漓盡致，那樣倒行逆施還以為不夠，助紂為虐，主張如此這般做下去才好。唉！果然日本人神聖不可侵犯嗎？臺灣人等於豚狗嗎？咄咄只用強權壓迫，不論公理，人心終是不服的呀。

另外，《臺灣民報》八月十二日報導，新任校友會長張聘三為交接校友會費五千元，而去拜訪下村校長。但是，下村校長認為新任會長必須獲得與會人數全體一致的同意才算合法，張聘三只獲得全體出席人數三分之二的贊成票，他認為不合法，因此不承認張聘三的會長身分。

林獻堂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二日起到歐亞各地旅行，一九二八年五月下旬回臺，無法得知林獻堂對於臺中一中罷課事件的看法<sup>111</sup>。但是，當時擔任豐原下南

<sup>110</sup>〈學生的罷學與學務當局者的責任〉，同前註，頁 2-3。

<sup>111</sup>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27 年內容，缺 3 月 21 日至 5 月 8 日。

坑保正的張麗俊(1868-1941)，和林獻堂同為櫟詩社成員，則在其《水竹居主人日記》記載罷課事件，可見臺灣仕紳對此事件的關心。

見新聞報臺中中學校生徒自二年生至五年生計二百餘名，俱於前數夜私逃，其原因係被學校舍監虐待，投校長又偏護舍監，聞學生欲發此風波，既預選委員數名，內四名面向三浦知事陳情，此事，三浦氏肯出仲裁否耶。又聞為此事，昨日臺中開市民大會，今日開中學卒業生會，明日開諸生徒父兄會云。<sup>112</sup>

戰後的下村湖人專門宣揚民主主義，離臺後從事大日本青年團工作時，也極力反抗國家主義的極權統治。甚至，他的友人或學生們回憶下村，都特別強調他的民主性格<sup>113</sup>。但是他在校友會的言行，卻給人強硬無理的印象。《次郎物語》中的恩師朝倉老師，雖是作者下村湖人的理想形象，但是下村在臺灣的言行，卻看不出任何朝倉老師的影子。為什麼為了袒護一個日籍廚夫，就非犧牲數十名臺灣人學生的前途不可呢？這是當時大多數臺灣人民的疑問。根據《臺灣民報》的報導，下村作為校長不但沒有盡到說明的責任，只是仗勢強逼學生服從，在臺灣人眼中看來，根本不是教育家，而是暴君、狂人。

## 六、張深切和下村湖人的對決

因為學生宿舍裏一個日本廚師的不誠實行為，而引發的臺中一中罷課事件，從臺灣人反帝國主義運動，發展為民族運動、反殖民主義運動。關於臺中一中罷課事件的原因，下村湖人晚年幾乎從未提起，但是有關下村的傳記或親友的回憶，則一致說是廣東的抗日分子來臺，煽動臺中一中學生所造成的<sup>114</sup>。例如，下村友人樋口孝的回憶文中說：

下村先生擔任臺中一中校長時，宿舍內發生不可思議的罷課事件。校長親自入宿舍監室調查原因，仍查不出真相。那也是理所當然，因為幕後的支援者

<sup>112</sup>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1927年5月26日，資料內容引自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網址：<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index.php?title=水竹居主人日記&oldid=266117>。

<sup>113</sup>安積得也：〈先生と民主主義〉，《一教育家の面影》，頁32-33。

<sup>114</sup>參見明石晴代：《次郎物語と父・下村湖人》，頁84。永杉喜輔：《下村湖人伝——次郎物語のモデル》（東京：柏樹社，1970年），頁133。

在廣東。臺中一中學生參加修學旅行，住宿廣東大清公司時，當地的學生強迫一中學生回臺後，要發動罷課。但是學生們無法實行。於是，張某等數人特別從廣東渡海來臺，直接指導。<sup>115</sup>

為「指導」臺中一中學生罷課運動，而特別從廣東渡海來臺的所謂「張某」，毫無疑問的就是張深切。

中國各地的臺灣人留學生受中國革命運動的影響，集結組織的團體其中一個就是「廣東臺灣學生聯合會」。這是以打倒臺灣島內日本帝國主義，完成民族革命為目標的團體。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廣東臺灣學生聯合會正式成立於廣州，成立前先製作了「毋忘臺灣」、「實踐三民主義」、「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成立臺灣議會」、「中國國民革命成功萬歲」、「解放弱小民族」等宣傳單，祕密送往臺灣，希望能喚醒臺灣四百萬島民的民族革命意識<sup>116</sup>。日本方面認為從這些宣傳單的內容來看，廣東臺灣學生聯合會表面上似乎是奉行辛亥革命以來的孫文思想，實際則是受到共產主義影響，有不少會員日後都成為共產黨員<sup>117</sup>。但實際情況則是張深切本人並未加入共產黨。一九二七年三月以廣東臺灣學生聯合會為基礎，成立了祕密革命組織「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張深切負責宣傳工作<sup>118</sup>。臺中一中罷課事件爆發後，廣東臺灣學生聯合會立刻發表宣言，刊載於同年六月十三日的《廣東民國日報》。宣言內容如下：

此次臺中第一中學學生，五百餘名為要反抗日本的壓迫蹂躪，蹶起宣佈同盟罷學，向日本政府開始猛烈的進攻，顯示我民族的威力，……我們知道這次臺灣學生罷課的原因，是學生受不了日本當局的無理壓迫而發生的。慘無人道的日本校長，侮辱了學生，並且利用軍警，逮捕我們的同胞，開除了二百六十餘名的學生，猶昂然聲言：「汝等臺灣人如再騷動，我自有處置之快刀……。」這樣他們視學生如牛馬，可以任意宰割摧殘。尤其最近我們的學生家長，參加學校當局召集的會議，本欲排解罷課風潮，……竟被包圍，拘捕家長代表張深切，提交於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司法機關審判……。

由此我們已明瞭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萬重罪惡和獍豸面目，敝會同仁……誓死

<sup>115</sup> 樋口孝：〈ストライキ頻發〉，《一教育家の面影》，頁 24-25。中文乃筆者翻譯。

<sup>116</sup>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頁 118-119。

<sup>117</sup> 同前註，頁 117。

<sup>118</sup> 同前註，頁 120。

召集在華留學的臺灣同志，盡量暴露日本的陰謀，徹底反抗日本帝國主義，願做被壓迫學生的後盾……集結於青天白日的國民政府之下，繼續研究學問，並鍛鍊革命精神，……俾能早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全國的同胞們！切望諸位一致援助我們，共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取消《馬關條約》，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臺灣！<sup>119</sup>

其實革命青年團成立不久，張深切返臺籌募資金時，因牽涉臺中一中罷課事件，被捕入獄，因此這份宣言應該不是張深切擬稿。至於為何牽涉罷課事件，張深切自傳《里程碑》有詳細說明：

這時，臺中一中的學生，有的探知我回臺，以前參加過「南支旅行」團的幾個學生，偷偷地來找我，要我領導他們和學校當局鬥爭，說學校當局無理壓迫他們，全校的學生都懷抱不滿，是一個絕好的機會。我告訴他們這次我負有重大使命，不能隨便參加公開活動，勸他們不可輕舉，惹出更大的麻煩。經過幾天，他們為了「老鼠糞事件」發生糾紛，又跑來問我對策。我苦勸他們不要拿鼠糞做問題，說這是小題大作，不值得拿做鬥爭題目。況且這時我的住宅前後都有特務埋伏，受著嚴重的監視，沒法子領導他們。他們血氣方剛，又在廣州受過了革命洗禮，思想更趨激烈，勃勃欲試，有的笑我膽怯，只會在日本勢力圈外吹牛皮，回到臺灣來，就像貓前老鼠，不敢動彈。有的責我不負時代使命，讓青年們大失所望。他們的熱情雖然搖動了我，但為顧慮自己所負使命，投鼠忌器，倒怕他們擴大事態，波及我的身上來。先是，我為了高雄印刷廠的大罷工，受了日本當局的懷疑，所以極要閃避他們的注意。況且自我回臺以後，恰巧臺灣的社會運動頓呈活躍，到處鬧風潮，當局對我更加嚴密監視。高雄的罷工，我是要協助如何收局，減少犧牲，預防偌大的罷工失去效果。但我脫不出特務的包圍離開臺中。高雄的消息頻傳危險，重大的犧牲是免不了的，迫不得已，我決定往高雄助戰，買了一張臺南的車票，佯往臺南，公然坐車南下，打算在臺南設法潛入高雄……。<sup>120</sup>

這樣，高雄罷工，我有南下行動，愈使神經過敏的當局生起懷疑；我沒有活動，也得受這麼嚴重監視，那堪再去指導一中罷學？但學生們正在興奮激

<sup>119</sup>張深切：《里程碑》，頁346。

<sup>120</sup>同前註，頁365-366。

昂，所以不能理解我的苦衷，強要我參加他們的運動。事件的發端，雖然是出於耗子屎，其實是積年的憤懣藉這機會爆發，絕不是只為了一兩件事造成的。所謂「老鼠糞事件」是甚麼？經過了這許久，實在有點迷糊記不清了；記得好像是寮生發現了飯中有鼠糞，幾個學生，走去譴責日人廚子，廚子不但不道歉，反而出言侮辱學生，學生憤然去向學校當局抗議，學校當局存心袒護廚子，所以不理會學生，廚子以為有勢可恃，氣焰凌人，學生忍無可忍，出手打了廚子，學校當局便認為學生有民族意識，反抗日人，決定處罰學生，由此而引起了臺灣人與日本人的民族對立。下村校長決定處罰打廚子的學生，有的開除學籍，有的命令「謹慎」。學生不服，就中到過廣州的學生特別激憤，計劃實行同盟罷學，形勢愈呈嚴重。<sup>121</sup>

《臺灣日日新報》對於事件發生原因的報導，非常地模糊曖昧。經由張深切的回憶內容，可知學生們發動罷課，其實是和宿舍主廚之間因老鼠糞問題有嚴重衝突，主廚毆打、侮辱臺灣學生有關。尤其下村校長不但袒護日本主廚，嚴格懲罰臺灣學生，甚至透過警察之力，召集家長集會，責備家長未能好好管教孩子。

校方召集了家長會，責備家長教子無方，應該嚴加訓斥。當時我以五年級黃河鐘的家長身分參加會議。下村校長擺著統治者的架子，亂發狂言，和家長們辯論了幾個鐘頭，沒有結論。這時我一直保持緘默，靜聽雙方的意見。最後，我指摘教育當局是非顛倒，教導無方，校方應負全部責任；但為委曲求全，尊師重道起見，我們家長願率領全體學生向學校當局道歉，希望不處罰學生為前提，圓滿解決這起事件。

校長理屈，無言可答，頻頻顧盼，希望學校教員代為答辯，救他下臺。但全體教員都垂下頭不發一言。他惱羞成怒，竟悍然拒絕了我的溫和建議。家長們都露出不滿的神情，醞釀著一觸即發的空氣，我嘆道：「學校當局一意孤行，和我們沒有商量的餘地，多談沒有用，不如散會吧！」這一聲，發生了意外的作用，全場的家長不約而同地散去了一大半，連我自己也啞然吃了一驚。家長會的散會，等於對校方投出了「哀的美敦書」，學生們認為是家長會的勝利，歡呼萬歲，立刻開始採取罷學行動，同時我也沒法子再逃避這個燃導火線的責任了。<sup>122</sup>

<sup>121</sup> 同前註，頁 370。

<sup>122</sup> 同前註，頁 370-371。

從這一段話「校長理屈，無言可答，頻頻顧盼，希望學校教員代為答辯，救他下臺。但全體教員都垂下頭，不發一語。他惱羞成怒，竟悍然拒絕了我的溫和建議」可以看出下村校長雖然自知理屈，但或許是基於上級總督府文教局的壓力，而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張深切不但參與事件，他也擬定八條具體戰略，積極指導罷課運動：

罷學作戰委員會隨時成立，作戰本部秘密地設置於學校後面隔一個小竹圍鄧錫銘家裏，連接地各種委員會都組織起來，我任總指揮決定了八條戰略：

- 一、即日罷學，但只限三年以上的學生參加。
- 二、固守學寮，絕對不退出，以求團結抗戰到底。
- 三、發動全島臺灣學生同情罷學，至達成目的為止。
- 四、與社會各界團體密切聯繫，呼籲全島民眾後援。
- 五、使罷學鬥爭發展為民族鬥爭。
- 六、呼籲全島一中出身同學組織救援會與校方折衝。
- 七、誓不犧牲一個同學，爭取完全勝利。
- 八、要求撤廢日臺學生的差別待遇。

臺灣空前未曾有的大罷學開始了！校方狼狽周章，急請警察署和憲兵隊派大批憲警包圍學校示威；夜間警察提燈，憲兵騎馬巡邏，盡量製造恐怖緊張的空氣。勇敢的學生襲擊舍監和教員，伸張聲勢，學生和憲警的對立，漸趨尖銳，有一部分的學生大起恐慌，主張離寮轉移陣地，避免和憲警發生正面衝突。

校方的毒辣蠻橫，刺激了下級沒有罷學的學生，連一年級的學生也不上課，掀起了全校的罷學。我極力反對退出學寮，說明一退出，力量立即分散，不能互相監視呼應，容易被學校當局各個擊破，意志薄弱的同學容易受校方利誘，引起全面的失敗。但學生們經不起憲警的威脅，贊成退寮的越佔優勢，我苦勸他們再忍耐三天，等到全島罷學才可以退出。我把呼籲全島同情罷學的檄文交與某君，叫他們作速發送，然而他們自作聰明，耽誤了時日，以為勝利在即，不必小題大作，他們和文協的指導都犯了錯誤，終於功敗垂成，付出了重大的犧牲。<sup>123</sup>

<sup>123</sup> 同前註，頁 371-372。

張深切在五月十一日召開的家長會議，從家長的立場和下村校長所展開的對答看來，這一場面實在非常有趣。一位是在臺灣民族運動史和臺灣文化運動史上留下重大貢獻的張深切，一位是近代日本教育史和文學史上知名的下村湖人。用日本相撲來比喻的話，是「好取組」(ko-tori-kumi)，意即實力相當的對手。

在這個對決中，受到總督府指令的下村校長，即使承認張深切的提案合情合理卻又無法反駁，因而大為狼狽，在家長們和教職員的面前，不得不沉默以對。下村校長大概也知道臺灣學生的背後，有張深切率領的臺灣學生聯合會等抗日勢力的支援。至此，罷課事件不僅是臺中一中校園內的糾紛而已，乃是臺灣總督府的文教政策和臺灣民族運動的對決了。作為臺灣總督府代理人的下村校長，如此頑固地採取高壓手段的背後，或許存在著總督府的政治策略。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紀錄，證實了張深切參與罷課事件的策劃，以及讓家長會解散的事實：

關於本案，雖經調查果為何人所為，但因察生團結，秘而不宣，故果為何人所為，仍然無法查明，故校方決定飭令五十餘名的學生退出寮舍，並為本案邀集父兄們，文化協會幹部張信義，農民組合幹部趙港及廣東革命青年團員張深切等人乃以父兄的資格出席，迫校方明示對學生的處分方法。父兄會於是陷於混亂，於鄰近父兄會場集合的察生則予以聲援，結局竟無法宣布退寮事。校方乃重新對全體五年級學生，命令退寮。張信義等人認為此舉不當，或責問校長，或對教育課長提出抗議，張深切則面晤察生，煽動結成同盟不退寮。五月十三日，二年級以上的察生也全部團結回家，於是竟成同盟罷學。<sup>124</sup>

一九二七年五月臺中一中罷課事件發生不久，張深切就被警察拘留。之後，關於臺中一中事件，他雖被判無罪，但是他參加臺灣革命青年團運動，則依違反治安維持法被起訴。如同前述，於一九二九年四月被判刑懲役二年，而其他團員也陸續被捕，臺灣革命青年團解散。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張深切等二十一名革命青年團員，在臺北地方法院接受審判的情形，這次的審理禁止旁聽。一九三〇年底張深切出獄後，以日文撰寫《鐵窗感想錄》(即《獄中記》)<sup>125</sup>，

<sup>124</sup> 王詩諒譯：《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誌》(臺北：稻鄉出版社，1988年)，頁403-404。

<sup>125</sup> 1930年底張深切出獄後撰寫《鐵窗感想錄》，分五次連載於《臺灣新民報》(1931年6月20日至



其中題為「審問篇」的章節，記載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十八日，他被臺中警察署長訊問的情形如下：

我第一次被逮捕，理由是參加了臺中一中的罷課事件。關於這起事件的審問，可以說滑稽之至，到現在為止，每當想起時，我都不免失笑。日本雖然是帝國主義國家，不過畢竟也是法治國家，因此，進行非法審問時，到底有愧於良心，其周章狼狽的樣子，看在眼裏，實在好笑。

負責第一次審問作業的，是臺中警署署長本身。我知道他們採取的作戰策略，是用嚇唬的手段，要我企圖逃跑，然後趁逃跑之際，將我逮捕。因此，我是不會上他們的當的！我不但沒有逃跑，反而在他們要我出面的八點至九點半的時間裏，前後主動到警署三趟，我也知道他們根本無法查起這樁毫無證據的「無頭公案」，然而，為防止罷課事件擴大，他們憑直覺認為有必要將我逮捕。

第三趟到警署時，署長不得不出來和我見面了。他扳著臉孔和我面對面坐下後，一逕吸著煙，在思考些什麼。我覺得場面很尷尬，所以自己也掏出香菸點了火。我們這樣對峙，活像即將刀劍出鞘的一對俠客。多年在警界服務，年紀約莫四、五十歲的紅臉署長，和年齡廿三、四歲涉世不深的白面書生在那裡對峙——旁邊還有幾名表情奸諂的高級警官在那裏走來走去。署長終於忍不住開腔了：

「你聽說過有關臺中一中罷課事件之事嗎？」

「我沒有聽說過。那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呢？」

「你少裝蒜！你是騙不過警察的！」

「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們怎麼可以誣賴我呢？」

「你別想強辯！你們把這個傢伙拖去關起來吧！」

署長突然站起來，發出如此的命令，一名警官立刻拖也似地把我帶到拘留所。被關達一個星期之久後，他們始終沒有向我審問，我於是大動肝火，向看守表示抗議，說他們要是繼續拘留我，我就要向檢察當局提出告訴。我這樣的恐嚇果真奏效，二、三天後，我就被叫出去接受審問。對我審問的是警

---

7月18日)。1947年4月，張深切以《鐵窗感想錄》為基礎，寫下《在廣東發動的臺灣革命運動史略·獄中記》，收入《張深切全集》，卷4。

署司法主任，他以有些畏首畏尾的態度，問我姓名、住址、經歷，然後站起來說句：「好啦！」就準備走開。我於是以憤怒的口氣對他吼叫：

「等一下！」

「你有事嗎？」

「你這是什麼話？我要你明白地告訴我，我被關在這裏的理由！」

「這不是你自己想得出來的嗎？」

「你們是根據什麼法拘留我？日本的憲法有寫可以無故拘留人民嗎？」

「你別在這裏說大話，我們很快會查出來的。」<sup>126</sup>

一星期後，警察署司法主任訊問時的情況如下：

司法主任好像心裏有愧，逃也似地匆匆離去。第三次審問緊接著很快就舉行。司法主任以非常沒有把握的語氣，問我為什麼出席臺中一中家長會的理由。我說我是黃河鐘的親戚，因此當然有權代表家長出席家長會。事實上這是一種詭辭，我知道當初姨丈無意參加，所以假借他的名義參加當日的大會。

「你在家長會上發表煽動性演講，不是嗎？」

「那不是煽動性演講，當日的大會有記錄，你們應該查得出來才對。我毋寧是勸解大家圓滿解決的。」

「由於你說了些什麼話，家長們都離開會場——事實不是這樣嗎？」

「沒有這種事情！你聽誰說的？」

「是學校當局說的。依據他們說的話，由於你在大會上說了些什麼，所以他們都退席了。」

「你怎麼可以用『說了些什麼』來指控人家呢？你把這個內容具體指出來吧！」

「自己說的話，當然自己最清楚，你自己說出來嘛。」

「我只說我們有這樣的誠意，而學校當局卻執迷不悟，所以我已無話可說，如此而已。」

「真的如此而已嗎？」

「確實如此！」

<sup>126</sup>張深切：《獄中記》，頁 281-282。

「你指導過罷課運動，對不對？」

「沒有這樣的事……」

「沒有……那麼那場罷課風波為什麼會弄得那麼大呢？」

「這我怎麼知道？罷課事件和我之間到底有什麼關連呢？你說我指導過罷課運動，請你提出證據來啊！」

「這不需要證據，我們知道得很清楚。你要是沒有回到臺中來，那麼大規模的罷課事件怎麼會發生呢？」

「你這句話就太離譜了，我根本不知道發生這次的罷課事件。你們指控我說，由於我回臺中來，所以發生了那樣的大事件，這不但沒有法律根據，更是含血噴人之舉，不是嗎？」

「混帳！你以為用這樣的詭辯就唬得過我嗎？好！你說你不明白，我會讓你有明白的一天的。」

「難道你要把我一直關在這裏……？」

「這還用得著說嗎？你要是坦白招來，我會早一點放你出去，不然，大家看看誰比較有耐性吧。好啦，你們再把這個傢伙關起來吧！」<sup>127</sup>

審問過程中張深切完全否認參與臺中一中事件，但是《獄中記》則具體說明了當時指揮一中學生的實際情形：

臺中一中罷課事件當然是我的指導下發動的，家長會也由於我的策動而和學校當局發生分裂，然而，比起臺灣獨立運動，這畢竟是微乎其微的事，就我本身的立場而言，我非儘早脫離眼前所受的拘束不可。我這一趟回臺灣來的目的，在於募捐臺灣革命運動的資金，這可以說使命重大，所以頗不願意因臺中一中罷課事件這等小事而受牽連。只是在命運之神的撥弄下，由於畢業旅行時前往廣東，那裏的學生知道我返臺之事後，立刻和我聯絡，我可以說因受連累而與之產生密切的關係，甚至為他們策劃全島性同情總罷課。當時要是能有多一天或二天的時間，我就能和全島同志取得聯絡，指導部也因而得以更形強化。遺憾的是，遭遇日本當局疾風迅雷式的檢舉，整個計畫因而歸於泡影，這是我由衷感到不甘心的事情。

當時我發出的指令，是徹底占據學生宿舍，採取困守學生宿舍之戰術，無論

<sup>127</sup> 同前註，頁 283-285。

發生何等重大事態，都不得撤離學生宿舍。遺憾的是，憲兵隊威嚇性出動，以及警戒巡邏之森嚴奏效，而且部分學生更仰承文化協會之指示，因此，學生們分成學生宿舍困守派和學生宿舍撤離派二派，並且互相發生傾軋，我因而不得不發出全員自學生宿舍退出之命令了。

在發出這項指令之前，我的住宅已被特務人員包圍，門前門後都各有兩名特務嚴密監視，使我一步都踏不出家門，然而，由於我擅於喬裝，他們不但不知道我頻頻外出，連證據都抓不到哩。發出最後指令時，我曾經以匍匐前進的姿態，在臺中一中校舍後面的墳地上爬行半天，步行五、六分鐘就可走到的距離，竟然花了半個小時以上才到達！學校後面的鄭錫銘兄家，是我們的聯絡場所。我為了要避開情治人員的注意，所以絕對不和學生直接來往，每次都自己親自到鄭兄家，或潛入學校擔任指導事宜，而實際上學生們的革命熱情，比我猶過之而無不及。他們前往廣東旅行時，我們曾經偷偷地將他們集合在中山大學以及其他場所，邀請要人對他們發表革命演講，也分發許多宣傳文件，所以他們算是受過革命洗禮的。

依據後來聽到的消息才知道，這起罷課事件付出的犧牲相當之巨，後來也一敗塗地，然而這次的鬥爭無疑是臺灣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革命性罷課事件，為歷來知識分子鬥爭事件上，最值得特筆大書的歷史性記錄。關於這一點，筆者有意另行專書著述，而在我被拘留期間，沒有一個人背叛團體，臺灣學生何等值得信賴，這是非常值得欣慰的一件事情。<sup>128</sup>

據此，可以看出張深切確實和來廣東旅行的一中學生有所接觸，而且他曾經計劃以罷課事件為契機，擴大發展為全臺灣規模的抗日民族主義運動。在某種層面上，臺中一中罷課事件是具有臺灣民族主義運動意義的。

## 結 語

臺中一中罷課事件的結果，數十名臺灣學生被開除學籍，張深切和其他革命青年團的二十多名臺灣社會青年被捕入獄。而因事件入獄後的張深切積極思考以文化力量抗拒異民族的殖民壓迫，因而創設臺灣文藝聯盟。可以說臺中一中罷課事件的

<sup>128</sup> 同前註，頁 286-287。

結果是臺灣民族運動的失敗，卻也是臺灣新文學運動的起始點。相反地，事件後下村虎六郎校長被總督府拔擢為臺北高等學校（今國立師範大學）教授，之後並高升為同校校長。不久，臺北高校爆發罷課事件，鬧事者主要都是日籍學生，下村校長為爭取學生的復學機會，不惜和當局抗爭，最後因為不願被降調為文教局官員，憤而辭職返國，日後以《次郎物語》、《論語物語》等著作稱名文壇。

然而，臺中一中罷課事件也成為下村湖人心靈的傷痛。相對於張深切晚年自傳《里程碑》、《獄中記》等著書裏再三言及臺中一中罷課事件，回到日本的下村湖人則幾乎終生不再提及臺灣。直到日本戰敗的一九四五年十月，下村在寫給曾任臺灣總督府文教局長的友人杉本良的信函，首度表明自己對不起臺灣人民，該信內容如下：

如您所言，只要想起臺灣的事情，就感到寂寞。理由既不是因為「徒勞的生活」，也不是來自所謂「國家」的立場，而是撼動全身的莫名寂寞感。我想藉這個機會衷心向臺灣和臺灣人致歉。每次翻閱通訊錄，看到臺灣人的名字，就特別覺得感傷。<sup>129</sup>

現存《下村湖人全集》等相關資料中，這是唯一直接對臺灣人表達歉意的文獻。這樣的反省及良心的苛責，數十年來一直橫亙在湖人的內心深處，直到日本戰敗後，才說出「衷心向臺灣和臺灣人致歉」的真情。

其實，在罷課事件中對決的張深切和下村湖人之間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張深切在一九五四年，五十歲時出版《孔子哲學評論》。《孔子哲學評論》剛出版時，曾被國民政府查禁，雖然查禁的原因至今不詳，現在則有專文考察該書<sup>130</sup>。而一八八四年出生，比張深切年長十歲的下村湖人，在一九三八年，也就是他五十五歲左右出版《論語物語》。相較於張深切的《孔子哲學評論》專書的讀者群，下村湖人的《論語物語》的讀者明顯多出許多，出版至今再三出版，是日本文壇的經典作品。究竟這兩本著作之間有何相似或值得比較之處，將是筆者今後探討的課題之一。

<sup>129</sup>〈1945年10月12日，致杉本良書簡〉，《下村湖人全集》，卷10，頁321-322。

<sup>130</sup>黃東珍：《張深切〈孔子哲學評論〉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林義正：〈張深切的孔子哲學研究〉，收入莊萬壽主編：《第四屆臺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2005年），頁77-90。

## 徵引書目

- 王文仁：《日治時期臺人畫家與作家的文藝合盟：以《臺灣文藝》(1934-36)為中心的考察》，臺北：博揚文化出版公司，2012年。
- 王詩諒譯：《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誌》，臺北：稻鄉出版社，1988年。
- 王學哲、方鵬程合著：《勇往向前：商務印書館百年經營史(1897-200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7年。
- 史春風：《商務印書館與中國近代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 何義麟：〈新民會〉，許雪姬總策劃：《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年。
- 李園會：《日據時期臺灣初等教育制度》，臺北：國立編譯館，2005年。
-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事業公司，2003年。
- 林翠鳳：《施梅樵及其漢詩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8年。
- 施懿琳、許俊雅、楊翠：《臺中縣文學發展史》，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
- 張志相、黃英哲編輯：〈張深切著作年表〉，陳芳明等編：《張深切全集》，臺北：文經出版社，1998年，卷2，「附錄」。
- 張志相編：〈張深切年譜〉，收入《張深切全集》，卷2，「附錄」。
- 張秀哲：《「勿忘臺灣」落花夢》，臺北：衛城出版社，2013年。
- 張季琳：〈下村湖人及其臺灣短歌〉，許雪姬主編：《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年。
- \_\_\_\_\_：〈下村湖人的臺灣經驗和《次郎物語》〉，《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7卷第3期，2007年9月，頁201-221。
- 張深切：《在廣東發動的臺灣革命運動史略·獄中記》，收入《張深切全集》，卷4。
- \_\_\_\_\_：《我與我的思想》，收入《張深切全集》，卷3。
- \_\_\_\_\_：《里程碑——又名：黑色的太陽》，收入《張深切全集》，卷1、2。

- 許文葵：〈螢窗夢痕〉，許文葵主編：《臺灣省立臺中一中校友年鑑》第2號，1959年8月，頁b2。
-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5年。
- 許雪姬：〈《灌園先生日記》的史料價值〉，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一九二七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第1冊。
- 陳芳明：〈亞細亞孤兒的聲音——張深切與《里程碑》〉，收入《張深切全集》，卷2。
- 陳亭卿：〈校友群英錄——陳亭卿訪談〉，《育才大道》創刊號，1998年12月。
- 陳慧坤：〈我的藝術生涯〉，《臺灣美術全集》，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5年，卷17。
- \_\_\_\_\_：〈校友群英錄——陳慧坤訪談〉，《育才大道》（臺中一中校友會）創刊號，1998年12月。
- 廖振富：《櫟詩社研究新論》，臺北：國立編譯館，2006年。
- 臺中一中編：《臺中一中八十年史》，臺中：國立臺中第一中學，1995年。
-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著：《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臺北：臺灣總督府，1939年；臺北：南天書局，1995年復刻版。
- 蔡錦堂：〈日本治臺後半期的「奢侈品」——臺北高等學校與近代臺灣菁英的誕生〉，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2012年。
- 鍾淑敏：〈館藏《臺灣日日新報》的史料價值及其利用〉，《館藏與臺灣史研究論文發表研討會彙編》，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4年。
- 藤井省三著，張季琳譯：〈殖民地臺灣的下村湖人——文教官僚的挫折和教養小說作家的誕生〉，《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1卷第3期，2011年9月，頁171-177。
- 下村湖人：《下村湖人全集》，東京：池田書店，1965年。
- \_\_\_\_\_：《下村湖人全集》，東京：國土社，1975年。
- 下村湖人生家保存會編著：《下村湖人生誕百二十年紀念——「大いなる道」》，佐賀：下村湖人生家保存會，2004年。

- 小豆澤英男：《神道と国民的自覚》，東京：越後屋書房，1943年。
- 大日本青年團：《大日本青年團史》，東京：日本青年館，1989年復刻版。
- 永杉喜輔：《下村湖人伝——次郎物語のモデル》，東京：柏樹社，1970年。
- 明石晴代：《次郎物語と父・下村湖人》，東京：勁草書房，1987年。
- 宮崎聖子：《植民地時期台湾における青年団と地域の変容》，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08年。
- 後藤文夫：〈下村さんと田沢義輔〉，《人生》，1955年7月號，頁73-74。
- \_\_\_\_\_：《一教育家の面影——下村湖人追想》，東京：新風土會，1956年。
- 若林正丈：〈総督府政治と台湾土着地主資産階級——公立台中中学校設立問題1912-1915年〉，《台湾抗日運動史研究》，東京：研文出版社，1983年。
- 張季琳：《台湾における下村湖人——文教官僚から作家へ》，東京：東方書店，2009年。
- 陳文松：《植民地支配と「青年」：台湾総督府の「青年」教科政策と地域社会の変容》，東京：東京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
- 緒方武藏編：《臺灣大年表》，臺北：臺北印刷株式会社，1938年。
- 〈臺中一中寄宿舎の炊事長の排斥運動子供らしい反感から〉，《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5月12日。
- 〈三年以上の學寮生全部一昨夜密かに脱寮、學校側は昨日臨時休校の上對策を協議、百七十九名に無期停學、臺中一中の學寮騒動擴大〉，《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5月14日。
- 〈群衆心理にかられ、輕舉盲動するは學生の一弊風、斷乎として矯正する必要がある＝某當局談〉，《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5月15日。
- 〈臺中一中學寮騒動益々擴大、更に在寮二年生六十七名脱寮、學校側直ちに無期停學處分、通學生にも波及せん〉，《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5月15日。
- 〈臺中一中盟休問題卒業生大會父兄大會等開か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5月16日。
- 〈臺中第一中學出身者大會招集通告〉，《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5月16日。
- 〈學校當局の責任を問ひその引責を期す 臺中一中卒業生大會〉，《臺灣日日新



- 報》，昭和2年5月17日。
- 〈臺中一中父兄大會在佛教會舉行〉，《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5月19日。
- 〈臺中一中事件無期停學者中反省した者には不日登校を許す〉、〈善良な生徒は困る一日も早く就學したい、某有力者談〉，《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5月20日。
- 〈暴行煽動者法院送り〉，《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5月20日。
- 〈不良學生十名を退學處分、臺中一中當局昨日發表〉，《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5月26日。
- 〈飽く迄理非を正す一中當局の英斷、陳謝して復校を願ひ出づるもの續出〉，《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5月27日。
- 張金水：〈不良學生を掃蕩せよ〉，《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5月27日。
- 〈臺中一中學生罷學的真相：校長爲要擁護一個内地人炊夫 威壓二百餘寮生全部退寮 父兄及出身者已一致憤起抗議了〉，《臺灣民報》第159號，昭和2年5月29日，頁5-9。
- 〈陳謝して来ねば斷然たる措置、復校を願ひ出る者も少くない、臺中一中盟休事件〉，《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5月30日。
- 〈直接行動さへ採れば何でも通る、この悪習を作らぬやう頑張る臺中一中校長〉，《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6月1日。
- 〈臺中一中停學生復校者續出、學校側は父兄を同道せねば復校を許さぬ〉，《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6月2日。
- 〈留京臺中一中出身者大會、爲講究臺中一中罷學解決案〉，《臺灣民報》第160號，昭和2年6月5日，頁4-5。
- 〈生徒側の謝罪で圓滿に解決、臺中一中盟休事件〉，《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6月7日。
- 〈自習時間中突如消燈、喊聲を擧げて舍監室を襲ひ、言語に絶する大亂暴、人を喰つた臺中一中復校生、學校側最後手段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6月11日。
- 〈十日夜も舍監室を襲ひ無茶苦茶に暴行、手がつけられぬ臺中第一中學寮生、附近の者何事かと戸外に飛出す〉，《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6月12日。
- 〈臺中一中之反響〉，《臺灣民報》第161號，昭和2年6月12日，頁10-11。

- 〈夜になると騒ぎ立てる臺中一中學寮生 學生にあるまじき卑劣さに心ある者を  
  颯感さす〉，《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6月13日。
- 〈臺中一中學寮事件、遂に二十一名を退學處分、屁とも思はず退寮する彼處分  
  者、寮内は破屋同様〉，《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6月14日。
- 〈不穩な唱歌硝子を破る音鯨波の聲が間斷なく交錯、物凄いオーケストラの演奏  
  が一時間も續いた、臺中一中學寮〉，《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6月  
  14日。
- 〈民族心理に觸る紛擾——その調停は地方官民の義務〉，《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  
  年6月15日。
- 〈臺中一中三年生又五名退學 英語の時間盟休を煽動して學校側は最後の一人迄  
  不良學生掃蕩〉，《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6月16日。
- 〈臺中一中問題と下村校長〉，《臺灣民報》第163號，昭和2年6月26日，頁12。
- 〈主客顛倒の怪現象〉，《臺灣民報》第163號，昭和2年6月26日，頁13。
- 〈師弟鬪爭の惡風〉，《臺灣民報》第163號，昭和2年6月26日，頁7。
- 〈臺中一中罷學的經過及結果：學校的態度依然無誠意，復校後騒鬧罷課續起，退  
  學了學生數十名〉，《臺灣民報》第165號，昭和2年7月10日，頁4-7。
- 〈學生的罷學與學務當局者的責任〉，《臺灣民報》第165號，昭和2年7月10  
  日，頁2-3。
- 〈臺中の一中に復も學校騒動、更に二十名退學、生徒側善後策を協議〉，《臺灣日  
  日新報》，昭和2年8月5日。
- 〈廿名の退學生は事件勃發以來登校せぬ學生、下村校長談〉，《臺灣日日新報》，  
  昭和2年8月6日。
- 〈臺中一中同窓會鬧得不成體統、提出會長不信任案〉，《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  
  年8月9日（夕刊）。
- 齋藤 孝：〈同時代感で甦る古典への誘い〉，《朝日新聞》，2008年8月18日。